分类号：

蘭州大學

研究生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中文）　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研究

论文题目（外文）　A study on envoys from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o Xiongnu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研究生姓名　崔丽芳

学科、专业　历史学·中国古代史

研究方向　秦汉史

学位级别　硕士

导师姓名、职称　雷紫翰　副教授

论文工作起止年月　2005年5月至2006年5月

论文提交日期　2006年5月

论文答辩日期　2006年5月

学位授予日期

校址：甘肃省兰州市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本人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学位论文中凡引用他人已经发表或未发表的成果、数据、观点等，均已明确注明出处。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

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崔丽芳　　日　期：2006.5.20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在导师指导下所完成的论文及相关的职务作品，知识产权归属兰州大学。本人完全了解兰州大学有关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存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兰州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任何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本人离校后发表、使用学位论文或与该论文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或成果时，第一署名单位仍然为兰州大学。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崔丽芳　导师签名：雷崇翰　日　期：06.5.20

内 容 摘 要

西汉初年至武帝前期，匈奴曾对汉朝的北部、 西部边疆造成严重威胁，甚至影响到了西汉政权的稳定，因而西汉时期，极为重视与匈奴的关系，西汉使者频繁出使匈奴。为解决匈奴问题，汉通西域。西汉统一、统治西域的过程中，西汉使者始终活跃在中原与西域的政治舞台上。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对西汉出使匈奴和西域的使者这一群体作了初步考察，认为虽然单个使者的能力有限，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为西汉与匈奴、西域之间的交流以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

文章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西汉使者出使匈奴、西域的动机。第三部分对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并对统治者选拔这些使者的方式、要求以及他们的来源作了初步分析。第四部分集中考察在西汉与匈奴、西域交往的过程中，西汉使者所从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交流活动。第五部分总括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的影响及特点。第六部分小结全文。

关键词：西汉　　匈奴　　西域　　使者

Abstract

Xiongnu had endangered the Northern and Western frontier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even threatened the stability of the regime from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earlier stage of Wu empire. As a result, the government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During the course, the envoys played a significant part on the political stag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paper makes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group of envoys on the basis of former study. It displays that the group of envoys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ommunicating with Xiongnu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 for unification of multiple nation.

The essay consists of six sections. The first part is preface. The second part elaborates the motivation that the envoys had a visit of Xiongnu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third part mainly emphasizes on division of the envoys for Xiongnu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means and requests of selecting these envoys and their origin. The forth part introduces their diplomatic activities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ield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ng with Xiongnu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fifth part summarizes the effec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voys from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o Xiongnu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last part is a conclusion of the whole article.

Key words: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Xiongnu; Western Regions; the envoy

目　录

绪 论

一 选题缘由与意义

与匈奴、西域的关系，在西汉对外关系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汉时期，交通和通讯相对而言还不甚发达，故而汉使频繁往来、互通信息，为中原与匈奴、西域关系的开创、维系和发展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然时至今日鲜有人对这个群体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忽视这样一个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过相当大贡献的历史群体的研究，实乃一大憾事！这种情形，应该予以改观。

对西汉而言，匈奴、西域是重要且关联度很强的两个地区，因此有学者强调指出匈奴、西域问题应该结合起来研究。[①]出使这两个地区的使者也是西汉有代表性且关系密切的两个群体，如有的使者出使西域主要是为了解决匈奴问题，有的使者出使匈奴则主要是为了解决西域问题，有的使者既出使过匈奴也出使过西域等。因此笔者着力于出使这两个地区的使者的研究，希望进而对西汉使者群体形成全面的认识。

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方面，西汉卓有成效，因此加强对西汉出使域外的使者——这一当时对外政策的重要执行者以及对外事务的重要参与者的研究很有意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发展今天的民族关系、外交关系以及选拔、培养外交工作者等，均应从古代使者活动的成败得失中寻找借鉴。

西汉时期出使匈奴和西域的使者，他们的品德、精神值得继续学习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以有益于华夏文明的传承！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将“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研究”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力图“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这个群体作系统、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二 研究现状

对西汉使匈奴、西域的使者，史家关注较早。晚明思想家、史学家李贽的《藏书》[②]，清代考据学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③]等书，就开始对他们予以一定的关注。

1969 年，台湾史学家黄宝实的《中国历代行人考》[④]一书，在对行人（使者）这一特殊职业作系统介绍之后，对历代行人都有简单研究。本书对初涉使者问题研究者很有帮助。

[①] 张维华:《汉史论集·自叙》，齐鲁书社 1980 年版，第 7 页。

[②] [明]李贽:《藏书》，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③] 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④] 黄宝石:《中国历代行人考》，台北：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虽然前辈史家对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较早予以了关注，但是关于他们的研究长期以来仍是在诸如中国外交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边疆史、中西交通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匈奴史、西域史等方面的论著中有所涉及，且常常是利用有关西汉使匈奴、西域的使者的资料，来探讨西汉与匈奴、西域的关系发展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交流，乃至道路交通和疆域划分等问题。与此同时，对西汉出使匈奴和西域的个别著名使者的研究成果也较多，有王家广：《张骞出使西域及其启示》（载《人文杂志》1988 年第 6 期）、余太山：《张骞西使新考》（载《西域研究》1993 年第 2 期）、戴天：《张骞—我国第一位伟大的外交家》（载《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5 年第 2 期）、宗立书：《西域使臣张骞》（载《中国民族》2004 年第 3 期）、史培军：《汉代第一任西域都护——郑吉》（载《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6 年第 2 期）、王东春：《对"苏武精神"的现代解释》（载《河北师院学报》1990 年第 4 期）、莫任南：《论傅介子出使西域的历史功绩》（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 年第 5 期）等文章，这些文章倾向于对张骞、苏武等使者个人的史迹和功绩的研究。就个体而言，这些研究已经较为透彻，有利于进一步展开对西汉使匈奴和西域使者群体的研究。但是以上两种情况均失之于没有真正将这些使者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群体进行研究。

近年来，黎虎、李大龙、王庆宪等著名学者开始认识到将使者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群体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并出了不少成果。迄今为止，直接关涉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群体研究的论文有：李大龙：《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者述论》（载《民族研究》1990 年第 6 期）、《西汉王朝藩属体制的建立和维系》（载《学习与探索》2005 年第 3 期），黎虎：《汉代外交使节的选拔》（载《兰州大学学报》2002 年第 6 期）、《汉代外交使节的人选》（载《人文杂志》2003 年第 6 期）、《汉代外交使团的组成》（载《中国文化研究》2004 年第 1 期），王庆宪：《匈奴与西汉频繁密切的使节往来》（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贾雪枫：《汉使身份考》（载《文史杂志》2002 年第 6 期 ）。这些文章主要利用关涉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的史料，将西汉使者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群体来考察，初步研究了西汉出使域外的使者的选派、使团的组成、以及他们在双方关系发展过程中的活动等问题。总体而言，成果喜人，但研究还缺乏全面性、系统性、深入性。

三 研究思路

本文以群体意义上的"使者"为研究对象，而非对"使者"个案的研究。在收集、梳理《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中与使者研究相关的史料的基础上，对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的出使动机、类型、选派、使行活动，以及他们的影响和特点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揭示出在西汉与匈奴以

及西域诸国的交往过程中，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诸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他们自身的一些特点。

四 研究理论与方法

无论任何学科，要发展，就应该实现研究视角与观念的创新。在理论方法上本文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同时也借用了其他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本文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1）唯物史观。摒弃对唯物史观僵化理解、教条运用，正确理解、正确运用唯物史观，对于搞好历史研究很有必要。本文在研究分析历史人物时，运用了唯物史观的客观性和主体性标准。（2）文献法。查阅和收集与本课题研究有关的各种文献资料，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3）社会学上关于“角色”划分的理论与方法。（4）外交学上关于外交官研究的一些理论和方法。

五 几个主要概念的界定和有关问题的说明

1、使者

“使者之称，其来旧矣。”《册府元龟》说使者乃“周官小行人之职掌，使适四方达天下之六节，又行夫掌邦国传递之小事”。[①]简言之，使者在邦国间传递文书或物品，类同信差。以高级官员或能人异士充任信差，就成了使者。中国古代的使者在出使时持有权力和身份的证明——节，“节”乃是象征天子之物。汉代使者出使，正使持节，副使假节，用以象征天子威权，因而“使者”又被称为“使节”。此外，使者有时也被称为“行人”，使者经常奔走于交往双方，所以“行人”是形象的称谓。之所以在邦交过程中要派使者而非信差，为己方考虑，是希望使者凭个人的智慧和魅力，顺利完成被交付的重要而复杂的外交使命；为对方考虑，是对对方表示尊重。

2、匈奴

匈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北方形成强大势力的民族，其名始见于战国文献。秦汉之际，匈奴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权。在其强大时期，“控制了中国东北部、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其统治区域东自今朝鲜边界，横跨蒙古高原，向西南伸入帕米尔山脉东西的西域许多地方，南到今晋北、陕北一带”[②]。

3、西域

汉代西域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以西、葱岭以东，即今天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新疆广大地区。广义的西域，则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一

[①]《册府元龟》卷652《奉使部·总序》，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7805页。
[②] 石云涛：《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

部分，乃至欧洲及北非地区，是中国当时对西方的统称。[①]凡《史记》、《汉书》等史籍中关于西域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本文都将提到，因此说本文将涉及广义的西域的概念。

由于政权分合的原因，匈奴和西域所辖地域范围并不固定，因此，从地理上来说，匈奴所辖的地域与西域诸国所辖的地域并不能截然分开。本文分析的重点是：在西汉与匈奴、西域诸国交往的过程中，西汉频繁派往匈奴、西域的使者的情况，无意于关注匈奴与西域的域土主权之争。

4、为便于研究和说明问题,下面对西汉与匈奴、西域关系作一概述。

西汉与匈奴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对抗——和亲——对抗——统辖的演变过程。双方最初的对抗发生在汉初到高帝七年（前 200 年）。白登之围后，西汉开始委曲求全，韬光养晦，高帝九年（前 198 年）汉匈关系开始进入和亲时期。元光二年（前 133 年）武帝采纳抗击派大臣的主张，开始反击匈奴。以马邑之谋为转折点，汉匈邦交破裂，再起兵端，双方和亲关系告一段落。元光二年至甘露二年（前 52 年），是汉匈关系史上第二个以武力征伐为主的对抗时期。甘露二年直至西汉灭亡，西汉对匈奴实行了羁縻统治政策，这是西汉统辖匈奴时期。

西汉与西域的关系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自建元三年（前 138 年）张骞首使西域[②]至太初元年（前 104 年）李广利率军西伐大宛，可称为西汉统一西域的准备阶段。二是，太初元年李广利西伐大宛至神爵三年（前 59 年）西域都护设立[③]。可以称为西汉统一西域阶段。三是，西域都护设立至西汉灭亡，这是西汉政府对西域全面正规地行使主权的阶段，可以称之为管理阶段。[④]

5、本文所涉及的时段为西汉本朝，不包括楚汉战争和王莽新朝。

[①] 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9 页；何芳川、万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14 页。

[②] 一说为建元二年。

[③] 西域都护始置的具体年代，历来有三种说法：即神爵三年说、地节二年说、神爵二年说。李炳泉：《关于汉代西域都护的两个问题》（《民族研究》，2003 年第 6 期）一文认为西域都护设官于汉宣帝神爵二年，立府施政在神爵三年。

[④] 参见李大龙：《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者论述》，《民族研究》，1990 年第 6 期，第 67—68 页。

第一章 西汉使者出使匈奴、西域的动机和条件

第一节 西汉使者出使匈奴、西域的动机

一 建功立业，报效国家

高祖刘邦布衣出身而据有天下，之后，历经高、惠、文、景四代的努力，至武帝即位之时，西汉政治日益稳固，经济日趋繁荣，国力日渐充实。武帝奋发有为，实施了一系列积极有为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措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汉武帝一改汉初一味妥协求和的外交政策，采用抗击和征抚相结合的双重手段，与周边民族调整了关系。在几代帝王的努力下，西汉生机勃勃地向前迈进，成为一个当时和以后的中国人民引以为自豪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唤发了时人对国家和社会的无比热爱，他们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因而普遍有一种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矢志报国的强烈愿望。西汉时期，出使号为“绝域”的西域和被称为蛮族的匈奴的部分汉使，一定程度上即是受这种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动机驱使，方踏上背井离乡、困难重重、险象环生、却又能很好地实现出使者建功立业的宏愿的艰难旅程。

张骞当之无愧是开通西域第一人。“关于张骞是出自何种动机或者想法志愿做这次冒险旅行，史书上没有留下任何记录”[①]，他的动机寓于行动之中。在张骞出使之前，甚至在他“凿空”以后，西域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绝域”而不乐于前往；但张骞却积极响应武帝的招募自请出使西域。第一次出使，他两次被俘，两次脱逃，顾不得在匈奴的娇妻和爱子，不畏惧远途中的沙漠和高山，历经 13 年持汉节不失才最终回到祖国。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元狩四年（前 119 年）竟然又一次出使。这次出使回国后的第二年，他就离开了人世。因此说张骞把自己的毕生都献给了出使西域事业是不过分的。张骞虽然没有留下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豪言壮语，但是他用一生的实践以及为西汉、甚至祖国千秋万代立下的不朽功勋，昭示了他出使的动机。

西汉的另一位外交家—终军，他因过早谢世而被称为“终童”[②]，也被后世称为少年外交家。终军曾在武帝元鼎（前 116—前 111 年）年间请使匈奴，他说：

> 军无横草之功，得列宿卫，食禄五年。边境时有风尘之警，臣宜被坚执锐，当矢石，启前行。驽下不习金革之事，今闻将遣匈奴使者，臣愿尽精厉气，奉佐明使，画吉凶于单于之前。[③]

[①] [日]羽田明著，娄贵书译：《西域史》，载《中亚史丛刊》，第 5 期，第 41 页。
[②]《汉书》卷 64《终军传》，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821 页。
[③]《汉书》卷 64《终军传》，第 2820 页。

终军请使，言辞恳切、意气风发，其希望通过出使异域建功立业的急迫心情和强烈愿望，昭然可见。

元帝时期，匈奴郅支单于要求西汉遣返他们的质子，西汉派卫司马谷吉送归。许多大臣认为送质子到郅支单于庭很危险，建议谷吉把质子送往边境，任其自回，就算完成任务。谷吉却上书言：

> ……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至庭。[①]

谷吉到郅支庭后，果然被杀害。谷吉明知出使郅支庭会有生命危险，但他强烈的报效祖国的愿望使得他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这种要求为国家建功立业而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令人敬仰。

总之，西汉出使匈奴和西域的使者中，有几乎将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出使西域事业的张骞，有年少却强烈要求通过出使建功立业的终军，有甘愿置自己生命于不顾而毅然出使的谷吉，还有晚年仍坚持出使的女外交家冯嫽……他们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出使动机昭示出伟大时代所赋予人们的奋发有为的精神。

二　追逐商业利润，进行商品贸易

西汉之所以要与匈奴频繁来往，与西域诸国加强联系，第一位的考虑当然是政治和军事目的，但也有开展经济交流，进行贸易往来的用意在内。西汉时期生产技术水平提高、经济发展、商业繁荣、许多手工业产品产量富裕，同时西汉对匈奴、西域的物品也有需求，这在客观上要求与匈奴之间互通关市，开通与西域之间的贸易商路，发展对外贸易。正如曾问吾先生所言："武帝之向西开拓，原为谋取国外市场，其派使出兵为开发经济市场之计划，正不下于远交近攻之军事作用也"[②]。

西汉时期，向匈奴和西域都曾派出不仅担负着一定的政治使命而且还承担着物资交换任务的使者。也就是说，出使西域和匈奴的使者中有一些是出于商业目的而出使的，其中有一些是为了追求实现国家的商业利益，而有一些则是为了追求实现使者团体甚至使者个人的商业利益。

出使匈奴的使者一般主要承担着政治使命，兼带从事一些"致赐"或者馈赠絮缯酒米等物品的任务，纯粹为了团体或者个人的商业利益而出使匈奴的罕见于史书记载。

主要为商业利益而出使的使者，以出使西域的为多。西汉尤其是武帝时期，在对西域政治经营的同时，还对西域进行了积极的经济经营，常常向西域诸国派

---

① 《汉书》卷70《陈汤传》，第3008页。
②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页。

遣贸易使者。出使西域的使者中除有主要承担着政治任务、捎带从事一些“致赐”或者馈赠任务的使者外，还有一些是为了国家、团体甚至个人的商业利益而出使的使者。武帝时期，曾派出大批使者到西域求取骏马，他们多是为了国家的商业利益而出使西域的；而另外一些使者，则是抱着个人发财主义思想而应募为使。张骞出使西域归国后，被封为“博望侯”，地位尊贵，于是请使西域的人络绎不绝，“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①]。西汉遣使西域，一度极为频繁，每年要派多批使者到西域等地贸易，“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他们以数百人的大使团，带着价值数千钜万的币帛，不畏艰难险阻，冒严寒、顶酷暑，到西域进行贸易，“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②]由此不仅可见丝路贸易的繁荣，亦可见丝路贸易的艰辛。

由上述内容不难发现，西汉出使匈奴和西域的使者，尤其是出使西域的使者，出使目的是追求商业利益的当不在少数。

三 追求封赏

西汉时期，很多人畏远、畏难而不愿出使异域，因此西汉政府除以发财机会奖励人们热心西行外，对出使有功者，在他们回国后还会给予丰厚的物质赏赐，甚至还赐予官爵。

> （张骞）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因前使绝国功，封骞为博望侯。[③]
>
> 乃封（刘）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建信侯。[④]
>
> 使持节护乌孙兵，……还，封惠为长罗侯。[⑤]

苏武被匈奴扣留 19 年，持节不辱，历经坎坷，终于在始元六年（前 81 年）春归国。昭帝“诏武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与苏武同归的常惠、徐圣、赵终根“皆拜为中郎，赐帛各二百匹。其余六人老归家，赐钱人十万，复终身”[⑥]。

出使域外的使者归来后，所获得的高官厚禄，诱使一些人甘愿冒一定的风险而出使异域，“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⑦]。可见张骞等人出使回国后，朝廷的官爵封赏所带来的“尊”，和物质封赏所带来的“贵”，成为驱使时人争相出使的原因之一。

[①]《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171 页。
[②]《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0 页。
[③]《汉书》卷 55《霍去病传》，第 479 页。
[④]《汉书》卷 43《娄敬传》，第 2121 页。
[⑤]《汉书》卷 69《西域传下》，第 3905 页。
[⑥]《汉书》卷 54《苏武传》，第 2467 页。
[⑦]《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1 页。

四 绝域探奇，求神求仙

汉代是一个神仙观念盛行的时代。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受到下层巫觋、方术士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一些来自统治阶级上层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如董仲舒改造儒学思想，提出了著名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说，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为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安排。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变化，国家的兴亡，都是上天意志的表现。天意与人事紧密相连，天以祥瑞灾异影响人，人的活动也能感动天。诸如此类的上层哲学思想为两汉谶纬迷信思想的进一步泛滥提供了理论依据。不仅如此，汉代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也为这种迷信局面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典型的莫过于汉武帝。在上下一致的推动下，汉代神仙迷信观念盛行。

> 战国、赢秦，诈力相尚，天理几绝，一若迷信既除，而复于汉代：自非其实。然其阐发汉代，仍为迷信之世界，则颇为近情。我国迷信之渐澹，实魏晋之世，玄学大兴，重明理而贱贱迹，尊人世而远天道，有以致之，若两汉乃一鬼神术数之世界也。[1]

神仙迷信观念盛行，所以升天成仙成为人们的一种向往。

> 大抵自战国时期，至秦汉之际，盛传一种神话，谓中国极西之地，有一神怪之水曰弱水，有一神怪之山曰昆仑，又有一神怪之仙曰西王母。至于西王母所居之地，或言在昆仑，或言玉山又或言在弱水之濒，总是神怪之地。[2]

《淮南子•地形训》曾比较详细地描述过昆仑山的神奇，说明了汉初人对于西方传说的关注。汉武之世，方士之说极端盛行，神仙之事非常频繁。因此西汉时期，有些人不可避免会有到神仙之地，探奇求仙的想法。汉代出使西域的使者中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出于到西域探奇求仙的动机而出使的。对此，日本学者百鸟库吉在《见于大秦传中的中国思想》一文，曾经这样说：

> ……但华人既属人类，自难免“老”“病”“死”的悲愁，以及“贫穷”“灾祸”等忧患。避免此种苦痛，又出自人性的欲望，故幻想出“东方蓬莱或扶桑的乐土，西方西王母所居的仙境”来了。有此幻想，遂生信仰，以为如获饮神药，即可成为不老不死的神仙。此种思想，似发生于战国时代，而盛行于汉魏时代。张骞之受武帝命而赴西域，即在此一期中。其随行人物中，必有深信可在西域参谒西王母宫阙之人。而且在“曾闻西王母故事”的华人之间，亦必有“深信此举可获闻西王母国详情”之人。《史记·大宛传》云：“安息国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但安息人绝无能知汉人幻想中的神仙——西王母——之理，所以此种记载，确系汉人的附会之谈而已。……再谈《史记•大宛传》，“有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按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一节，卒而读之，或觉不重要，但经细读而后，复参阅当时情事，由此即可窥见武帝之信念。武帝常好神仙，亦系深信西方有西

---

[1] 吕思勉：《秦汉史》（下册），开明书店 1947 年版，第 800 页。
[2] 张维华：《汉史论集》，第 351 页。

王母仙境之人，故希望张骞一至西域，必能详悉西王母国情形。……司马迁对于《禹本纪》及《山海经》所记荒诞无稽之事，并不置信，但在其所著《史记•大宛传》之中，对于西王母一点，亦未能否认。由此而言，备极尊贵如武帝，学识高深如司马迁，尚信世有西王母，毋怪当时的一般民众，自然对之深信不疑了。[①]

百鸟库吉先生主要强调了喜好神仙的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有使他了解西王母仙境情形的意图。笔者认为，即便这不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重要原因，至少有这方面因素是可能的。张骞出使归来后，又介绍了那么多神奇的东西：险象环生的旅行、陌生的国度、奇奇怪怪的植物、神奇的汉血马等，无疑又进一步引发了一些人们的好奇心，于是张骞出使回国后，“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②]。可见神奇的东西对西汉的人颇具吸引力。一批批的汉使，或由于个人好奇心的驱动，或受政府以及其他什么方面人士的委托而出使西域。

五　逃避刑罚

西汉时期，出使匈奴和西域，尤其是出使西域，路途遥远，沿途食宿没有保障，甚至还有来自自然的威胁和途中其他民族的攻杀危险，所以非人所乐往。但是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发展的需要，西汉又必须派出大量的出使匈奴和西域的使者。于是西汉政府为了鼓励人们出使，除采取利益诱惑的措施之外，还一度采取了一些强硬的措施。如故意治重罪，迫使人们为赎罪而求出使，就是一项比较极端的措施。

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

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相效。[③]

由此可见，汉武帝为派更多的使者出使西域，对使者的选拔极为不负责任。这样选拔出的使者，有些自然不能完成任务，武帝则治以重罪，有些人为免于遭受刑罚，不得已只得再次请求出使。“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④]武帝英明神武，他应该知道不负责任地选拔使者定然会导致一些不良后果，所以他相当程度上是有意制造这种后果，以达到鼓励、甚至逼人出使的目的。当然这种有意的行为，也有不得已的成分在内，因为当时的确少有人乐于出使绝域。武帝是为了加强对外联系，才采取了不得已的手段。他这种有意或者说无奈而采取的逼人出使政策，就可能导致一些使者出于免受刑罚的目的而出使绝域，因而说有些使者出

[①] 见《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引自张维华：《汉史论集》，第354页。
[②]《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1页。
[③]《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1页。
[④]《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1页。

使匈奴和西域有逃避刑罚的动机。

六 传播华夏文明

众所周知，西汉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是由西汉早期出使匈奴的使者刘敬所提出的。汉高祖初次北征败于平城之后，意识到匈奴暂时是不能以武力来征服的，就问计于刘敬，刘敬献计说：

> 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①]

以上是刘敬“和亲”建议的主要内容。从这一记载不难看出，刘敬的和亲建议不是简单地将汉室公主嫁给匈奴单于，而是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嫁公主，即将“长公主”嫁与匈奴单于；二是进行大量的物资交流，即“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三是进行文化交流，即“使辩士风谕以礼节”[②]。其中“使辩士风谕以礼节”这一项与西汉使者前往匈奴传播华夏文明有直接关系。依从刘敬建议，西汉派不少辩士作为使者出使匈奴。如投降匈奴的汉使中行说（行音航 háng，说音悦 yuè）曾与其他汉使辩论汉与匈奴文化的优劣。到后来“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无多言……’”[③]因为辩论较多，所以中行说才可能会惧怕雄辩的汉使，尽量避免与之进行论辩。可见西汉时期，确实依照刘敬的建议派出大批汉使前往匈奴“风谕以礼节”。

先秦时期，儒家就有“夷夏之别”和“用夏变夷”的思想。汉代正是儒学的发展时期，汉代使者，尤其是儒生使者，很可能深受这种“夷夏观”影响。儒者往往又有很强的宣扬本民族文化优越性的文化使命感，因而西汉出使匈奴、西域的使者，尤其是出使匈奴的使者，他们出使当有劝谕匈奴放弃自身传统，接受中原的价值观念，最终达到以夏变夷效果的动机。最初，出使匈奴的汉使刘敬提出了具有“用夏变夷”意图的和亲政策；而后来的汉使到匈奴后，往往又是围绕匈奴和汉文化孰优孰劣的焦点进行辩论。披览这些史实，就不难理解笔者的看法了。

[①]《史记》卷 99《刘敬叔孙通列传》，第 2719 页。
[②]《汉书》卷 43《娄敬传》，第 2122 页。
[③]《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第 2901 页。

第二节 西汉使者出使匈奴、西域的客观条件

一 政治条件

从政治上来说，西汉之所以能够派多批次、大规模的使者团体出使，在于继秦之后，西汉又实现了大一统。西汉建立后，政权渐趋巩固。武帝时期，通过一系列强化措施，西汉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阶段。武帝以后，又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西汉从建立之初，就开始汲取前朝教训，实行一系列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从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安定了社会秩序，有利于王朝平稳地向前发展。正因为有了强大的政权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作后盾，所以西汉才有条件发展与边疆民族和周边国家的关系。面对秦汉之际强大起来的，以攻掠为特性的匈奴的不断挑衅，西汉采取了由软到硬的各种措施予以对付。在对匈奴实施各种政策措施的过程中，西汉频繁地派遣了许多使者到匈奴去执行各种任务。

西汉实施“断匈奴右臂”[①]策略，企图切断匈奴军事上的据点和经济上的后盾，同时为促进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寻找商品贸易市场等原因，还制定出西部开发战略。张骞出使，汉通西域，这是中西交通开拓的标志，也揭开中原政权开发和治理西域地区的序幕。之后，赵破奴攻楼兰(今新疆罗布泊一带)、破姑师(今新疆吐鲁番一带)，李广利两伐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西域诸国相继臣服于西汉。神爵二年(前 60 年)，匈奴发生政变，主管西域的日逐王率众归汉。神爵三年(前 59 年)，郑吉“中西域而立莫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②]，西域都护正式设立。此后“汉之号令班西域矣”[③]，西域被正式纳入西汉版图。西域都护建立前后，西汉在西域地区屯垦戍边、驻扎军队、修建国防及交通设施，并且不断派使者和官员到西域，加强西汉与西域之间的联系。西汉对西域地区的开发治理，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以及西域经济发展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过程中，西汉使者对加强中原与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联系，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 经济条件

西汉初年以来，在封建生产关系有所调整的条件下，又实行了一系列鼓励恢复经济发展的措施，再加上西汉时期劳动人民的辛苦劳动，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发展起来。司马迁在《平准书》中说：

>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

---

① 《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68 页。
② 《汉书》卷 70《郑吉传》，第 3006 页。
③ 《汉书》卷 70《郑吉传》，第 3006 页。

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①]

这说明，至武帝时期，西汉财富有所增加，同时百姓生活也有了一定改善，出现社会经济繁荣的局面。史书还记载，汉兴以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②]。可见当时生产与消费都突破了原来的地域界限，所谓"农工商交易之路通"[③]。正因为西汉社会经济不断地恢复和发展，所以才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解决边疆的民族问题，并且与较远的西域诸国建立联系。具体而言，也是西汉能够支付大批使者出使匈奴和西域的交通和食宿费用，以及支持汉使代表朝廷实施一些厚赂边疆民族和周边国家的政策的经济基础。

三　文化条件

文化对人们活动的影响常常很大，但它所发生的作用常常是潜移默化的，不易被察觉到。西汉时期，外交范围扩大，开始和异文化圈的匈奴、西域进行交往，建立在一定文化背景基础之上。李学勤先生曾把东周列国划分为 7 个文化圈：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④]由于政权分裂和交通不畅等原因，诸文化圈之间都比较封闭隔绝，地域文化差异很大，文化圈的地域差异所造成的文化割裂现象，严重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试图通过统一文化来消除秦与六国故地的文化隔阂，巩固大一统政权的文化基础，这对中华文明的统一起到空前的推动作用。但文化的融合发展是个渐进的过程，而秦的国祚又极其短暂，所以战国到秦代，延及汉初，除齐鲁文化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外，楚文化的扩展和秦文化的传布仍是我国文化史上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现象。到武帝时期，各地区文化进一步融汇，齐鲁文化、楚文化和秦文化完成了合流过程，这三大文化体系汇集交融，形成了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⑤]正是在这一文化交融的过程之中和基础之上，西汉派出许多出使匈奴和西域的使者。虽然他们的出使动机多种多样，但促进文化上的大一统，将大汉帝国的文明向更远的地方传播，应该是他们的出使动机之一。西汉出使匈奴的使者，屡屡与匈奴的接待人员辩论中原文明与匈奴文明孰优孰劣，西汉出使西域的使者往往要求西域诸国遵守汉朝礼节，诸如此类的事件，无不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辉煌灿烂的汉文化，对域外的国家和民族有强大的吸引力，使得它们愿意接受西汉使者出使其国，为其带去中原地区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等诸

[①]《史记》卷 30《平准书》，第 1420 页。
[②]《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第 3261 页。
[③]《史记》卷 30《平准书》，第 1442 页。
[④] 参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1—12 页。
[⑤] 参见王子今：《中国古代交通文化》，三环出版社 1990 版，第 91 页。

方面的信息，也是西汉使者频繁地出使域外的外部因素之一。

四 交通条件

秦朝政权将中央统一规划的交通建设视为执政要务之一，汉代帝王同样将交通建设看作执政的重要条件，因此秦汉时期交通网四通八达，域内域外交通都空前地发达。直道是秦统一以后规划施工的高质量的南北大通道。到西汉时期，直道仍为北通匈奴的交通要道。直道具体走向为由咸阳北行1800里至边防重镇九原，出九原郡（汉五原郡）经北边道[①]抵匈奴。由直道向东，还有几条大道起到联系内地与塞外的作用，这几条大道是：由长安出发，经上郡，出云中郡的大道；由长安出发，经平阳、晋阳直达雁门郡的太原雁门道；经河东、上党，或由河内北上至邯郸、广阳、右北平出塞的邯郸广阳道；还有一条道路沿黄海、渤海海岸北上至于辽西、辽东的并海道。处于东边的出塞道路，出塞以后，可能是再沿北边道的东段到匈奴；除此以外，在直道以西，还有另一条重要的道路就是陇西北地道，沿这条道路出塞以后，大约是再沿北边道西段到达匈奴。[②]这大致就是西汉时期因袭前代而继续使用的通北方的几条交通干线。其中陇西北地道、直道、经上郡出云中的道路、太原雁门道由于起点离西汉的统治中心较近，终点离匈奴的统治中心较近，所以是西汉北上和匈奴南下使用频繁的交通路线，也应该是西汉使者出使匈奴所经的几条重要路线。

西汉时期，使者出使西域所走的路线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一般认为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使得这条中西陆路交通线得以正式开启，为中国与中亚、西亚和南亚，乃至欧洲、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开创了新纪元。“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是以中国的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过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进而连结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丝绸之路”大体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自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接通西域；中段：自敦煌郡出两关（玉门关、阳关）进入新疆。西段：指新疆以西地区。[③]

除交通道路发达以外，汉代的交通服务制度和设施也比较完备。首先，汉政府在全国大中城市，尤其是郡国首府与交通冲要地点，便设传舍。

> 汉代传舍有相当的规模，配有传厨、传车和驿马，并有足够的住宿用品。传舍负责接待国家过往官员、信使，以及政府特命征召的贤士名人。客人到传舍食宿，必须交验符传，说明自己的身份爵位，按规定享受相应的接待。[④]

其次，与传舍相配套，西汉时期乡亭遍设于城乡，尤其是交通干线上。亭作为乡

[①] 秦统一后，在战国长城基础上营建新长城防线时，因施工与布防的需要，沿长城出现的横贯东西的交通大道。
[②] 参见王子今：《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第104页。
[③] 参见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④] 陈鸿彝：《中华交通史话》，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2页。

里的一个公用的基层机构，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其功能之一就是关照行旅，为行旅提供停留食宿之所。在使行时间比较长，食宿相对困难的条件下，遍布城乡的亭很好地履行了类似于传舍的功能，为过往的官员、信使等行旅提供了食宿方便。除此以外，汉代的客店、饮食店不再象秦朝那样受到严格管制，因此私人的旅店、饮食店也遍地开花，成为服务于汉代繁盛的交通往来的一大行业，也很好地补充了政府设施的不足。在政府设施不方便的情况之下，过往的使者等行旅可能就是利用这些店铺来解决食宿问题的。另外随着与域外联系加强，西汉的交通道路以及设施，还延伸到域外的一些地区。

畅通的道路交通、遍布的驿站、方便的饮食等，都是汉使能够经常出使匈奴和西域的客观条件。

第二章 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的选派

第一节 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的类型

按出使任务来分，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大致可分为多种类型。

1、和亲使者

和亲使者是西汉派往匈奴和西域完成和亲任务的使者。西汉与匈奴及一些西域国家都曾多次和亲。在西汉与它们建立和亲关系的各阶段，西汉均派出了许多和亲使者。

一般来说，在西汉与匈奴或者西域诸国的和亲过程中，当对方有和亲的意愿时，除对方直接请求和亲外，还通过汉使来传递这种意思。

> 单于弟左谷蠡王思卫律言，欲和亲而恐汉不听，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风汉使者。然其侵盗益希，遇汉使愈厚，欲以渐致和亲，汉亦羁縻之。[①]

> 先是乌孙昆弥翁归靡因长罗侯常惠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复尚少主，结婚内附，畔去匈奴。[②]

和亲协议的达成，通常也是由汉使来实现的。如："使刘敬往结和亲约。"[③]"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与匈奴和亲。"[④]西汉与匈奴、西域正式和亲前，往往派使者前往迎接娶聘使团。"上美乌孙新立大功，又重绝故业，遣使者至乌孙，先迎取聘。"[⑤]西汉"公主"前往和亲时，也多是由和亲使者护送到达。"高帝乃使刘敬

[①]《汉书》卷 94《匈奴传上》，第 3783 页。
[②]《汉书》卷 78《萧望之传》，第 3279 页。
[③]《史记》卷 99《刘敬叔孙通列传》，第 2719 页。
[④]《汉书》卷 5《景帝纪》，第 140 页。
[⑤]《汉书》卷 96《西域传下》，第 3905 页。

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①]“使长罗侯光禄大夫（常）惠为副，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②]西汉“公主”和亲域外邦国后，有的使者还要在和亲国陪伴和亲公主多年。“参与昭君出塞和亲的还有她的两个亲侄儿王歙、王飒，他们伴随昭君在匈奴生活了很多年，归汉后成为汉廷对胡外交的专家。”[③]

由此可知，从和亲消息的传递到和亲协议的最终达成，再到护送公主出嫁匈奴及西域诸国，直至在和亲国陪和亲公主生活，均有西汉和亲使者参与，和亲使者是西汉和亲政策的主要参与执行者。

2、探查使者

探查使者是西汉派往匈奴和西域诸国探查或者探寻对方情况的使者。依史料来看，这样的探查使者以西汉派往匈奴去的为多。汉初，高祖刘邦为了抗击匈奴，先后派多批使者去探查匈奴的虚实。

> 汉七年，韩王信反，高帝自往击。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击汉，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徒见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易击。

结果刘邦还是不敢贸然前进，于是“使刘敬复往使匈奴”[④]。又如《汉书·苏武传》记载：“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⑤]西汉曾向匈奴多次派出探查使者，表明西汉在处理与匈奴的关系时，相当谨慎。

3、赠赐使者

赠赐使者是西汉派往匈奴和西域履行赏赐任务的使者。无论在与匈奴还是与西域诸国的交往过程中，西汉都奉行“厚往薄来”原则。西汉不仅对这些国家来汉的王及官员、使者进行赏赐，而且还多次派使者到这些国家致赐。如汉文帝时曾派中大夫意、谒者令肩到匈奴，复单于书，复故约，赐匈奴“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⑥]。又如细君公主到乌孙后，心情悲伤，作《黄鹄歌》，“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⑦]。赠赐使者在代表西汉政权对周边国家和民族实施“厚赂”政策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4、册封使者

册封使者是西汉派往匈奴和西域执行册封任务的使者。西汉的册封使者以到西域诸国的为多。西汉派往西域的册封使者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西汉专门派册封使者到西域的某个国家进行册封。如乌孙的乌就屠与元贵靡兄弟失和，争夺权位，

[①]《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5页。
[②]《汉书》卷96《西域传下》，第3905页。
[③] 吴郁芳：《昭君家族与汉胡外交》，《江汉论坛》，1995年第1期，第66页。
[④]《汉书》卷43《娄敬传》，第2121页。
[⑤]《汉书》卷54《苏武传》，第2459页。
[⑥]《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7页。
[⑦]《汉书》卷96《西域传下》，第3903页。

汉遣“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①]。还有一种是西汉派遣使者到西域从事其他事务，使者顺便进行了册封事宜。如罽宾王遣使入汉奉献，汉遣关都尉文忠为使，送罽宾使者归国，在送归过程中，“（罽宾）王复欲害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印绶”[②]。可见文忠作为西汉派遣的迎送使者，顺便也册封了新的罽宾王。

5、请盟使者

请盟使者是西汉派往一些比较有实力、又与匈奴有矛盾的西域国家，请求建立抗匈联盟的使者。张骞是西汉向西域派出的第一个请盟使者。他第一次出使，主要是为实现同与匈奴有世仇的大月氏（今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结盟，达到共同夹击匈奴的目的。张骞带着100多人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新疆、葱岭而至大宛，最后到达大月氏。第二次出使，是为联络与匈奴有矛盾的乌孙，彻底击败匈奴。张骞率领的使团到达了乌孙（今伊犁河流域），还派随行副史访问大宛、康居（今撒马尔罕一带）、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等地）、身毒（今印度）等国。西汉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均是为了建立抗匈联盟，达到夹击匈奴的目的。

6、迎送使者

迎送使者是西汉派出迎送匈奴和西域各国入汉或出汉的各类人员的使者。迎送使者迎送的对象，包括匈奴和西域各国的王、侍子以及使者等。迎送各国国王的汉使，如班伯。“河平中，单于来朝，上使（班）伯持节迎于塞下。”[③]迎送各国侍子的汉使，如谷吉。“郅支单于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遣使上书求侍子。汉遣谷吉送之，郅支杀吉。”[④]迎送各国使者的汉使，如送罽宾使者的汉使。成帝和平四年（前25年），“（罽宾）复遣使献，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而杜钦认为，道远不便，而罽宾来汉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⑤]，不值劳烦汉使送至县度，可至皮山而还，后来成帝依杜钦建议而行，派汉使将罽宾使者送至皮山。“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⑥]可见迎送使者的职责，主要是负责来宾的安全等相关事宜。

7、求取使者

求取使者是西汉派往匈奴和西域各国求取对方某种东西的使者。鉴于“厚往薄来”原则，西汉一般较少派出求取使者。西汉向匈奴派遣求取使者，史书仅见

[①]《汉书》卷96《西域传下》，第3907页。
[②]《汉书》卷96《西域传上》，第3885页。
[③]《汉书》卷100《叙传》，第4199页。
[④]《汉书》卷94《匈奴传下》，第3801页。
[⑤]《汉书》卷96《西域传上》，3886页。
[⑥]《汉书》卷96《西域传上》，第3886页。

一例。成帝舅王根获知“匈奴有斗入汉地，直张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如得之，于边甚饶，国家有广地之卖，将军显功，垂于无穷”，于是他让出使匈奴的中郎将夏侯籓、副校尉韩容向单于求取那块宝地，单于没有答应。后来夏侯籓、韩容“复使匈奴，至则求地”。[①]最终，西汉使者未能求得那块宝地。西汉派往西域的求取使者中，比较著名的是求取西域宝马的使者，所谓“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②]

由此可见，首先，只有当匈奴、西域的某种东西对西汉来说极其重要时，西汉才派使者前往求取。其次，西汉一般是在比较强盛时期，向西域和匈奴派出求取使者，如上边提到的求取事件，都不是发生在西汉国力较弱的早期或末期；而且有时西汉在派出求取使者时，还带有某种程度的挑衅意味，如汉武帝就以大宛不肯给汉使宝马为借口，对大宛发动了规模浩大的军事进攻。

8、贸易使者

贸易使者主要是西汉派往匈奴和西域各国直接从事商品贸易，或者以赐物为名，间接从事物资交流的使者。西汉与匈奴及西域各国的官方贸易，多以贡赐和交聘馈遗的形式进行。这种形式，是在中原王朝与边区少数民族的贸易交往中，仍然残存着礼仪外衣的一种贸易往来，是中国古代始终存在的一种贸易形式。西汉曾多次直接派使者到匈奴和西域诸国探访并“致赐”。另外，凡西汉“公主”和亲出嫁，皇帝也要派使者赠送许多陪嫁物品。上述情况下派出的使者，往往在承担着其他出使任务的同时，也承担着贡赐和交聘馈遗等官方贸易任务，因此这里认为他们也充当着“贸易使者”角色，这类使者往往与前面提到的赐物、和亲等使者身份重复，故而在此不多言。

此外，还有一些汉使在西域直接从事了比较频繁的商品贸易活动，以致他们在西域的一些国家“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③]。西汉为了与西域各国开展经济交流、进行商品贸易，曾多次招募和派遣贸易使者。而配合汉武帝“勤远略”的政策，一些汉族商人为了给自己的私人商业资本寻找向外扩展的出路，也尽力争取出使机会，他们或者应募出使，或者随使团、军吏出使。直接从事商品贸易的使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商人，“商人持使节，是商人即使者，使者即商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④]

以上的两类使者，我们统称之为贸易使者。

9、宣谕使者

宣谕使者是西汉派往匈奴和西域传达皇帝旨意的使者。竟宁元年(前33年)，

[①]《汉书》卷94《匈奴传下》，第3810页。
[②]《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0页。
[③]《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3页。
[④]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62页。

西汉把王昭君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①]。这里郎中侯应力排众议，认为不能答应单于提出的撤消西汉北部边防的请求。元帝听从侯应的建议，决定不解除边塞武备，拒绝单于的请求。为不致引起单于误会，元帝遣使口谕单于曰：

> 单于上书愿罢北边吏士屯戍，子孙世世保塞。单于乡慕礼义，所以为民计者甚厚，此长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敬谕单于之意，朕无疑焉。为单于怪其不罢，故使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晓单于。

许嘉传达圣谕之后，单于致歉曰：“愚不知大计，天子幸使大臣告语，甚厚。”[②]这件事情从而得到圆满的解决。在处理这件事情过程中，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充当了宣谕使者的角色。

10、劝诱使者

劝诱使者是西汉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派往匈奴和西域进行游说的使者。汉武帝元狩四年（前 119 年），西汉派丞相长史任敞到匈奴进行劝降，以失败告终。

> 单于用赵信计，遣使好辞请和亲。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汉使敞使于单于。单于闻敞计，大怒，留之不遣。[③]

《汉书》记载：

> 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生，以为欲说，折其辞辩。少年，以为欲刺，折其气。[④]

可见西汉向匈奴遣派的劝诱使者为数不少，所以才使得匈奴人一见西汉的儒生使者，就“以为欲说，折其辞辩”。西汉的劝诱使者到匈奴去的任务，有时是直接劝降；有时是通过传播华夏文化，间接起到诱降的作用。

11、招还使者

招还使者是西汉派往匈奴、西域招回流落其地的比较有身份的汉人，或者请还死于匈奴、西域的汉人的尸体的使者。如汉将李陵在武帝时期投降匈奴。昭帝继立“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陵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⑤]又如昭帝即位数年后，匈奴与汉和亲，双方关系缓和，西汉也曾两次派使者到匈奴招还被匈奴扣留的汉使苏武。再如，汉使谷吉被郅支单于杀

[①]《汉书》卷 94《匈奴传下》，第 3803 页。
[②]《汉书》卷 94《匈奴传下》，第 3805 页。
[③]《汉书》卷 94《匈奴传上》，第 3771 页。
[④]《汉书》卷 94《匈奴传上》，第 3773 页。
[⑤]《汉书》卷 54《李陵传》，第 2458 页。

害，“汉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颜师古注曰：“死，尸也”。[①]

西汉派往匈奴和西域的招还使者，多数情况下是去招回汉使或者请还汉使的尸体，说明西汉比较重视出使人员，这和使者身份的特殊性有一定的关系。使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代表，而在“朕即国家”的君主专制时代，代表国家和代表皇帝很难判然区分。而无论代表国家还是皇帝均表明使者的身份地位很尊贵，这就使得他们不能不被重视。所以对于不归的汉使，西汉要么派专使招回被扣留者，要么派专使请还已死者的尸体。

12、慰问使者

慰问使者是西汉派往匈奴和西域进行慰问的使者。例如元封六年（前 105 年），乌维单于死，子乌师庐立为单于，号为儿单于，“汉使两使者，一吊单于，一吊右贤王，欲以乖其国”[②]。再如“五凤中匈奴大乱，议者多曰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萧望之却认为：“……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③]。宣帝听从萧望之的建议，遣使吊问。又如解忧公主与汉使一起谋害狂王，狂王受伤，西汉派出使者给狂王送医药等物品进行慰问，以缓和与乌孙的矛盾。

> 汉遣中郎将张遵持医药治狂王，赐金二十斤，采缯……副使季都别将医养视狂王，狂王从十余骑送之。[④]

西汉派慰问使者到匈奴或者西域诸国进行安抚和慰问，大致在出现如下情况时：对方老王死，新王立；对方发生灾难、动乱；西汉与对方发生不愉快的事件，企图通过安抚慰问，修复两国关系。

13、将兵使者

将兵使者是指西汉向匈奴或西域派出的持节领兵使者。昭帝末年，匈奴与车师联合进攻乌孙，并威胁乌孙与西汉断绝关系，乌孙向汉求救。宣帝本始三年（前 71 年），西汉与乌孙联合夹击匈奴。“汉兵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并出”，同时西汉还“遣校尉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翎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这次反攻，西汉与乌孙的联军大败匈奴，“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污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头，乌孙皆自取所虏获”。[⑤]在此事件中，常惠就充当了将兵使者的角色。将兵使者的出现，与西汉当时与周边的民族和国家，尤其是与匈奴之间的战争比较频繁有一定关系。

14、屯田使者

屯田使者是西汉派往匈奴和西域屯田的使者。

[①]《汉书》卷 70《陈汤传》，第 3009 页。
[②]《汉书》卷 94《匈奴传上》，第 2915 页。
[③]《汉书》卷 78《萧望之传》，第 3280 页。
[④]《汉书》卷 96《西域传下》，第 3906 页。
[⑤]《汉书》卷 96《西域传下》，第 3905 页。

地节二年（前 68 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①]

汉复遣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然众心皆附小昆弥”。[②]

以上提到的屯田使者在西汉屯田异域的过程中，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

15、受降使者

受降使者是西汉派往匈奴和西域接受对方投降的使者。

康居太子保苏匿率众万余人欲降，会宗奏状，汉遣卫司马逢迎。会宗发戊己校尉兵随司马受降。司马畏其众，欲令降者皆自缚，保苏匿怨望，举众亡去。[③]

这里提到的身份为卫司马的使者，被西汉派往西域接受康居太子投降，可以称之为受降使者。很遗憾，这位受降使者没有顺利完成这次受降任务。

16、吊祭使者

吊祭使者是西汉派去吊祭亡故的匈奴单于或西域诸国君王的使者。如鸿嘉元年（前 20 年）正月，“匈奴单于雕陶莫皋死。五月甲午，遣中郎将杨兴使吊”。[④]杨兴在这里就充当了吊祭使者的角色。

以上是按出使任务的不同对西汉派往匈奴和西域的使者做了分类考察，虽不能说已囊括无遗，但大体上包括了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的主要类型。文献有载的所有西汉出使匈奴和西域的使者的情况，见文后附表 1、附表 2。

第二节　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的选拔

一　选拔方式及其特点

西汉时期，外交圈逐渐扩大，外交往来日益频繁，以致出使域外的使者供不应求。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⑤]

由此不难窥知，汉代国运昌隆之时急需大量外交人才从事繁忙的外交事务的情况，以及使外的使者车水马龙、前后相望于途的情景。关于汉代使外使者的选拔，黎虎先生的专文《汉代外交使节的选拔》[⑥]，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在黎先生研究的基础上，下面对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的选拔，做一些简略的介绍。

---

① 《汉书》卷 96《西域传下》，第 3922 页。
② 《汉书》卷 96《西域传下》，第 3907 页。
③ 《汉书》卷 70《段会宗传》，第 3030 页。
④ 《汉书》卷 26《天文志》，第 1311 页。
⑤ 《汉书》卷 65《东方朔传》，第 2863 页。
⑥ 黎虎：《汉代外交使节的选拔》，《兰州大学学报》，2002 年第 6 期。

汉代使匈奴和西域使者的选拔，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招募

招募，是通过募集的方式，大范围、多渠道地求得人才，以完成各种特殊的、艰难的外交任务，是选拔出使匈奴、西域使者的重要方式之一。武帝建元年间（前140—前135），为寻找西域月氏国，“乃募能使者”，于是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①]张骞即是通过应募而成为首位出使西域的汉使。随苏武使团出使匈奴的常惠也是被招募为使的。常惠“自奋应募，随移中监苏武使匈奴”。[②]由于招募来的人员大多是自愿为使，一般比较具有献身精神，所以通过招募能选拔出一些比较优秀的使者，如张骞和常惠就是出类拔萃的。

2、自请

自请，也就是自己请求奉使。“自请是与招募紧密相联的一种选拔方式，那些应募者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说是自请者，但自请者往往比应募者更积极主动，有时在国家并未公开招募时也可能提出请求”。[③]西汉威震西域的使者傅介子，就曾自请出使。元凤四年（前77年）傅介子“以骏马监求使大宛”，昭帝命令傅介子在出使大宛的同时顺道“责楼兰、龟兹国”[④]。傅介子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任务，受到了嘉奖。江充也是“自请，愿使匈奴”[⑤]，而被武帝派遣出使匈奴的。

当自请者是出于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动机而请使的时候，这种方式往往能够选拔到一些真正具有高素质，同时还具有献身精神的优秀外交使者；而当自请者是贪图一己之私而请使，同时国家由于急需外交人才，审查也不严格时，自请往往容易造成遣使过滥、用人不当的后果。武帝时期出现的请使西域的热潮，就导致了当时外交使者良莠不齐，整体素质不高的后果，西汉对外交往的发展因此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3、举荐

举荐，是中央百官或者地方政府举荐出使的使者人选。一般是在有了出使需要时，由皇帝下诏百官举荐。如宣帝“诏书令公卿选可使匈奴者”。[⑥]有时皇帝也诏令地方政府举荐。元封五年(前106年)，武帝下诏曰：“……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⑦]。这是诏令州郡官吏推荐具有特殊品质和才能的人充任外交使者。由于举者和被举者相互牵连，因此通过举荐选拔的使者，一般素质也较高。如出使西域的冯奉世就是受韩增举荐，他在使行过程中审时度势，建立奇功，表现极为出色。

---

① 《汉书》卷61《张骞传》，第2687页。
② 《汉书》卷70《常惠传》，第3003页。
③ 黎虎：《汉代外交使节的选拔》，第13页。
④ 《汉书》卷70《傅介子传》，第3001页。
⑤ 《汉书》卷45《江充传》，2177页。
⑥ 《汉书》卷51《路温舒传》，第2371页。
⑦ 《汉书》卷6《武帝纪》，第197页。

4、征召

征召，是皇帝直接下诏给某人，征召其出使。这是汉代选拔官吏的方式之一，在外交使者的选拔中有时也采取这种方式。如乌孙昆弥乌就屠死后，西域都护段会宗立安日为小昆弥。后“乌孙小昆弥安日为降民所杀，诸翎侯大乱”，于是汉成帝“诏征故金城太守段会宗为左曹中郎将、光禄大夫，使安辑乌孙，立安日弟末振将为小昆弥，定其国而还”[①]，这是成帝征召段会宗为使。一般来说，被征召者均声名已著且具有卓越的外交才能和非凡的外交业绩，皇帝认为可以委以重任，所以征召他们为使。

5、指派

指派，是皇帝在臣僚中挑选并指派出使的使者。汉初，高祖刘邦率军北上抗击匈奴时，就曾指派刘敬“复往使匈奴”[②]。由于刘敬曾成功出使匈奴，后来又提出和亲建议，所以深得刘邦赏识，故而与匈奴和亲时，又“使刘敬往结和亲约”[③]。皇帝在指派使者时，大多是指派一些自己比较了解，也比较赏识的人，因此指派的使者一般也能够比较好地完成使命。

由于西汉时期，匈奴、西域非人所乐往，因此皇帝还指派一些刚拜官的人，甚至一些根本就不愿出使的人。前者如公孙弘：

> （公孙弘）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④]

后者如中行说：

> 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公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⑤]

可见少数被指派为使的人或本不擅长充当使者，或被指派为使违背他们本人意愿，所以有时不能很好地完成他们肩负的使命。

二 人选的来源及要求

1、人选的来源

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的选拔方式多种多样。那么，选拔这些使者时主要以哪些人为对象？出使域外的使者主要来源于那些机构？充使的主要是那些官员呢？笔者就所掌握的资料对此做一简单、粗略的分析。

光禄勋官员

“光禄勋秦名郎中令，统辖郎内诸官。武帝太初元年（西元前一〇四年）改

[①]《资治通鉴》卷32《汉纪》成帝元延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5页。
[②]《汉书》卷43《娄敬传》，第2121页。
[③]《史记》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19页。
[④]《汉书》卷58《公孙弘传》，第2613页。
[⑤]《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8页。

名光禄勋……光禄勋居禁中，宫外有属狱，名光禄外部”。[①]光禄勋为九卿之一，其属官有大夫、郎、谒者，以及期门、羽林等。大夫执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其中，中大夫于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为光禄大夫。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郎中有车、户、骑三将。谒者执掌宾赞受事，有仆射。期门掌执兵送从，有仆射。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更名虎贲郎，置中郎将。羽林掌送从，次期门，后更名羽林骑。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②]以上大体是《汉书》中对光禄勋属官情况的说明。对照笔者所列的附表1、附表2，不难发现西汉时期出使匈奴和西域的使者中，有不少是光禄勋属官。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光禄勋所属的诸大夫和诸郎具有“无常事，唯诏命所使”、“掌守门户，出充车骑”[③]的性质，所以充当使者可以说是责无旁贷。第二，光禄勋诸官接近皇帝，所以也容易被派遣。对光禄勋一职，如淳解释曰：“勋之言阍也。阍者，古主门官也。光禄主宫门”[④]，说明光禄勋是由上古时代为君主守门的阍者发展而来，可见光禄勋及其下属诸官容易接近君主或皇帝。秦汉时期，使者主要是代表皇帝出使，所以皇帝在选派使者的时，多从身边的光禄勋郎官系统选拔派遣。因此在西汉与匈奴、西域交往的过程中，光禄勋的郎官作为使者来往奔波，异常活跃。

武官

西汉时期，朝廷常常派遣武官充使。这些武官有卫司马、车骑都尉、车骑将军、右将军长史、校尉、副校尉、长水校尉、关都尉等。如五凤四年（前54年），与解忧公主一起合谋刺杀乌孙昆弥狂王的汉使魏和意是卫司马。竟宁元年（前33年），罽宾王谴使入汉奉献，罽宾使者归国时，西汉派出送行的使者文忠是关都尉。西汉时期出使匈奴和西域的使者中武官为数不少。西汉遣派众多武官作为使者出使匈奴和西域，与当时出使这两个地区路途遥远、艰险，而且沿途安全没有保障等具体条件有关。武官一般意志坚强、身体壮健，有一定的自卫能力且常常手握兵权，比较适合充任出使匈奴、西域的使者。武官大量充使，是秦汉时期的使者人选有别于先秦时期的特点之一。

中官

西汉时，也遣派中官出使匈奴和西域。出使这两个地区的中官，见诸于史料的有中大谒者、黄门、宦者等。惠帝三年（前192年），冒顿遣使送书给吕后，言辞极为亵嫚。吕后暂忍怒火，令大谒者张释报书。据考证这里的“大谒者”具体当为“中大谒者”[⑤]。《史记集解》裴骃案：如淳曰：“《百官表》‘谒者掌宾赞

[①] 《秦汉政治制度史》，第121—122页。
[②] 参见《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上》，第727页。
[③] 《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上》，第727页。
[④] 《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第727页。
[⑤] 《史记》有“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语。（《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第405页。）

受事'，灌婴为中谒者。后常以奄人为之，诸官加'中'者多奄人也。"[1]由此看来，中大谒者张释是一个中官。文帝时期出使匈奴的中行说，史书明言是一个宦者。武帝时期出使西域大宛的姚定汉是黄门官员[2]。黄门和宦者均属于西汉九卿之一的少府。少府的职掌是负责皇帝的一切给养，所以一些少府官员与皇帝接触频繁，关系比较密切。因此属于少府的一些中官被遣派出使，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列侯

一般来说，被封为侯的人地位较高不宜充使，但西汉却有几位以侯的身份出使的使者。其中较有名的是建信侯刘敬和长罗侯常惠。汉高祖为嘉奖刘敬出使匈奴探得可靠情报，封刘敬为关内侯，号建信侯。[3]后来为汉匈和亲之事，已为建信侯的刘敬再次出使匈奴。本始二年（前 72 年），校尉常惠手持旄节前往乌孙，监护 5 万乌孙精骑东击匈奴右部。乌孙 5 万精骑配合西汉出击匈奴的 15 万大军，直捣匈奴右谷蠡王庭，旗开得胜，一举俘虏匈奴单于的叔、伯、嫂、小王、都尉、千长、骑将等 4 万余人，缴获马、牛、骆驼、羊近 70 万头(只)。凯旋回朝后，常惠被封为"长罗侯"[4]。不久，身为长罗侯的常惠又受命携带大量金银、丝绸等物再次出使乌孙，犒赏乌孙贵族。此后，长罗侯还几次出使乌孙。另外，西汉的高昌侯董忠也曾作为使者出使匈奴。对以上几位以侯的身份出使域外的使者稍作分析，可以发现：封侯之前，他们大多以成功出使匈奴或西域而倍受皇帝重视，所以在继续与这些地区交往时，皇帝为保险起见，重新启用熟悉该地区情况而已然封侯的功臣出使。

其他官员

使匈奴、西域使者的来源，除以上所列外，还有一些来自其他职位的官员，如御士大夫、丞相长史、博士等。景帝元年（前 156 年）至代下与匈奴和亲的翟青为遣御史大夫；建元元年（前 40 年）出使匈奴的公孙弘为博士；元狩四年（前 119 年）前往匈奴诱降的任敞为丞相长史。因为这些官员只是偶尔充使，故不再单列。秦汉时御史大夫为三公之一，仅次于丞相。《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其主要职务为监察、执法，兼掌重要文书图籍。汉代的御史大夫往往升为丞相，成帝时改称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5]。哀帝在位，时改时复。丞相长史，辅佐丞相，督率诸吏，处理各种政务，秩俸比千石。博士，源于战国，秦沿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

[1]《史记》卷 9《吕太后本纪》集解，第 405 页。
[2]《汉书》有"黄门苏文、姚定汉舆置公车令空舍……"语。（《汉书》卷 97《外戚传上》，第 3950 页。）
[3] 参见《史记》卷 99《刘敬叔孙通列传》，第 2718 页。
[4] 参见《汉书》卷 96《西域传下》，第 3905 页。
[5]《汉书》卷 19《百官公卿表上》，第 725 页。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①]秦及汉初，博士所掌为古今史事待问及书籍典守。

从以上对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的来源所作的分析来看：首先，他们的来源并不是十分固定。除较主要的几类来源外，三公之一、秩比丞相的御史大夫，辅助丞相、秩俸比千石的丞相长史等都可能成为出使匈奴和西域的使者，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其次，在西汉的使者群体中，以使匈奴使者中地位高的为多，如建信侯刘敬、高昌侯董忠、御史大夫翟青、二千石官路充国等都曾出使匈奴。由此可见西汉对匈奴重视程度之高。

2、对使者素质的要求

汉代是中国古典外交的开拓创新时期，频繁的外交往来需要选拔大批使者，那么，这些使者究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通过分析，笔者认为他们应该具备以下的品质和才能。

第一，强壮有力，勇敢无畏。其实这也就是要选择那些堪称“勇士”或“壮士”的人来充任使者。勇士（壮士）一般具有强壮有力，勇敢无畏，重名节，轻生死的特点。“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豺狼，发怒吐气，声音动天。”[②]“勇士不却死而灭名”[③]，“勇士极其节”[④]。先秦时期，就常以勇士（壮士）充任使者，汉代沿袭前代，也常以勇士出使匈奴和西域。

《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赞曰：“自元狩之际，张骞始通西域，至于地节，郑吉建都护之号，讫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选。”[⑤]可见傅介子、常惠、郑吉、甘延寿、陈汤、段会宗等人都堪称“勇士”型的使外使者。史书中有时径直称某使者为壮士（勇士）。如太初元年（前 104 年），西汉“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⑥]。另外西汉使者中还有一些少年出使者，“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少年，以为欲刺，折其气”[⑦]。《管子》说：“内辨士，使图其计；内勇士，使高其气”[⑧]，勇士长于“气”，因此，对付勇士须“折其气”。匈奴通过“折其气”来对付的少年使者，应当是“勇士”型汉使。

勇士（壮士）型使者一般均有“武”的一面，但作为外交使者，有勇无谋是万万不行的。不少出使匈奴、西域的勇士型使者文武兼备，有勇有谋。如陈汤“少好书，博达善属文”[⑨]。出使西域途中，矫制立功，诛斩莎车王的汉使冯奉世，

[①]《汉书》卷 19《百官公卿表上》，第 726 页。
[②]《史记》卷 117《司马相如列传》正义，第 3053 页，。
[③]《史记》卷 83《鲁仲连邹阳列传》，第 2465 页。
[④]《汉书》卷 67《梅福传》，第 2917 页。
[⑤]《汉书》卷 70《傅常郑甘陈段传》赞，第 3032 页。
[⑥]《汉书》卷 61《张骞传》，第 2697 页。
[⑦]《汉书》卷 94《匈奴传上》，第 3773 页。
[⑧]《管子》卷 17《禁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 页。
[⑨]《汉书》卷 70《陈汤传》，第 3007 页。

不仅勇武无畏，而且还“学《春秋》涉大义，读兵法明习”[1]。陈汤、甘延寿以及冯奉世等人能矫制立功，关键在于他们有谋略，适时地抓住了时机，从而立下大功。

为什么西汉向匈奴和西域派出了众多的“勇士”型的外交使者呢？黎虎先生认为：其一，由于汉代外交范围扩大，异文化圈之间的交往，尤其是和多武少文的匈奴和西域诸国的交往，并不过多地依赖于“辩士”的滔滔说辞和长篇大论，故而西汉派出了许多“武士”型的使者。其二，开辟、创新阶段的外交具有浓厚的野蛮性。西汉与诸多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外交中的野蛮行为时有发生，导致了外交中“武”的成分增加，这也客观上要求一些“武士”型使者出使。其三，外交范围扩大导致外交旅途的空前艰险，这也要求外交使者身体强壮，勇敢无畏。[2]

笔者认为，这可能与西汉有意迎合异文化圈的民族或国家的习俗也有一定的关系。游牧民族多崇尚壮健，例如匈奴族习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3]。西域的大月氏、乌孙、康居等国基本上也与匈奴同俗。[4]西汉将使者派往匈奴和西域各国，自然希望这些使者能得到它们的认可和尊重，并受到的它们的欢迎，从而能够顺利完成其外交使命。因此西汉在派出使者的时候，会考虑适当迎合这些国家或者民族“贵壮健”的习俗。

第二，品德高尚，忠于祖国。古代出使域外的使者，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今天的外交官。他们常与别的国家或民族打交道，他们的品德好坏极为重要，往小里说关乎外事的成败，往大里说关乎一国之安危。

在汉使当中，苏武是一个品德高尚、忠于祖国，“使于四方，不辱君命”[5]的典型代表。苏武使至匈奴，因属下连累，要受到审讯。他对随行人员说：“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6]，于是就准备自杀殉国，获救之后，虽匈奴多方设法诱降，他都坚贞不屈，匈奴单于无计可施，将他流放至人迹罕至的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

> （苏）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7]

面对威逼利诱，经受艰难困苦，苏武谨记自己身为大汉使者的职责，持节不辱，历经坎坷，终于在被匈奴拘留 18 年后回到祖国。西汉时期，还有许多品德高尚、

---

[1]《汉书》卷 79《冯奉世传》，第 3294 页。
[2] 黎虎：《汉代外交使节的选拔》，第 17 页。
[3]《汉书》卷 94《匈奴传上》，第 3743 页。
[4] 参见《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61 页。
[5]《论语·子路》，《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508 页。
[6]《汉书》卷 54《苏武传》，第 2461 页。
[7]《汉书》卷 54《苏武传》，第 2463 页。

忠于祖国的使匈奴、西域使者。出使匈奴的刘敬，一生中多次出使，不辱使命。出使西域的张骞、冯嫽、段会宗、傅介子等人，几乎都是毕生奔波，将毕生献给了西汉的外交事业。段会宗三任西域都护，五使乌孙，最终以 74 岁高龄出使乌孙，75 岁时，病死于乌孙。冯嫽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使者，她曾随解忧公主和亲乌孙，且“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①]，后又被朝廷任命为正式使者，一生致力于西汉与西域各国的关系，尤其对西汉与乌孙联盟的巩固作出了很大贡献。年逾花甲之时，她还上书皇帝，请求再次出使乌孙，不辞辛苦踏上西去的万里行程。这些西汉的使者，多次无怨无悔地奔波于时人所不愿前往的匈奴和西域，而且始终忠诚于祖国，不辱使命。可见西汉在选派出使域外的使者时，对这种忠于祖国的品德应是极为重视的。

然而，西汉时期，也出现过使者投降叛变、不能顺利完成任务等有辱使命的情况。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忽视了对使者品德的注重而引发的后果，恰好从反面说明使者品德的至关重要性。这也是值得引以为鉴的。

第三，富有学识，能言善辩。作为一个出使域外的使者，在出使过程中要代表本国沟通各种关系，从事各种外交事务，进行各种谈判，因此要富有学识，能言善辩。西汉时期，广泛吸收富有学识、能言善辩的人，作为使者出使匈奴和西域。西汉初年，刘敬首使匈奴归来后，刘邦在不辨是非的情况下，曾经骂刘敬：“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②]刘邦说刘敬是凭口舌得官，可见刘敬是个能言善辩的人。正因为刘敬能言善辩，所以他几次出使都顺利地完成任务。后来刘敬向高祖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之策，其中的一项措施主张西汉遣辩士为使出使匈奴，传播华夏文化。由于西汉常派遣儒生型的辩士作为使者出使匈奴，故匈奴每见西汉所遣使者，“其儒先，以为欲说，折其辩”[③]。“儒先”，《汉书》记作“儒生”[④]。与派往西域的使者相比，西汉派往匈奴的使者具有辩才者尤其多。

出使域外的使者，不仅要能言善辩，而且也要富有学识。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般来说，能言善辩者，学识修养也应该不错。曾经请使匈奴，后来以出使南越而闻名的终军就是这样一位使者，他“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⑤]。这些具有较高文化修养且能言善辩的使者，一般能在出使过程中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顺利完成任务，令统治者比较满意。

第四，容貌端庄，具有威仪。一般官员的选拔，主要注重学识才干，对于外貌不甚注重。但是外交使者代表了国家和皇帝的形象，因此历来在选拔外交使者

[①]《汉书》卷 96《西域传下》，第 3907 页。
[②]《史记》卷 99《刘敬叔孙通列传》，第 2718 页。
[③]《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上》，第 2913 页。
[④]《汉书》卷 94《匈奴传上》，第 3773 页。
[⑤]《汉书》卷 64《终军传》，第 2814 页。

的时候，比较注重形象，西汉时期使者的选拔也是如此。史书在描述不少青史留名的使者的外表形象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夸赞。元光五年（前 130）武帝召见公孙弘时见其“容貌甚丽”[①]。自请出使匈奴的江充也是一位“容貌甚壮”的使者。

> 初，充召见犬台宫，自请愿以所常被服冠见上。上许之。充衣纱縠禅衣，曲裾后垂交输，冠禅纚步摇冠，飞翮之缨。充为人魁岸，容貌甚壮。帝望见而异之，谓左右曰：“燕赵固多奇士。”既至前，问以当世政事，上说之。充因自请，愿使匈奴。诏问其状，充对曰：“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事不可豫图。’上以充为谒者使匈奴。”[②]

还有出使匈奴的萧育“为人严猛尚威”[③]，也是一位具有威仪的人。由此看来，形象外貌也应该是汉代选拔使者时较为注重的方面。

第三章　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的使行活动

第一节　西汉使者在匈奴的主要活动

一　主要政治活动

1、探查匈奴动静，搜集情报信息。匈奴问题关系到西汉的安危，因此西汉一代，非常注意派使者到匈奴探查动静并搜集与之有关的政治情报，尤其是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汉初，高祖刘邦抗击匈奴，不敢贸然出击。为摸清对方情况，他多次派使者前往探查，相继归来的使者一致认为可以出击，但他还是迟疑不决，又派刘敬继续探查。可见西汉前期汉匈武装对峙的时候，西汉对匈奴的动静极为关注。而受刘敬之前的“十余辈”使者所搜集情报的影响，刘邦选择北上，则说明汉使搜集的情报，对西汉的政治、军事行动影响很大。而匈奴示以假象，资以假情报的具体做法则表明：西汉前期，汉使到匈奴刺探军情的活动比较频繁，且已经引起匈奴的注意。

西汉与匈奴曾经有过多次和亲。匈奴有和亲愿望的信息，往往也是汉使在与匈奴的交往活动中，通过一定手段获得，回国后传达给西汉皇帝的。例如元封四年（前 107 年），西汉派王乌等人前往匈奴侦察情况，他因懂得匈奴风俗，故而“单于爱之，详许甘言……以求和亲”[④]。

《汉书》记载：“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

[①]《汉书》卷 58《公孙弘传》，第 2617 页。
[②]《汉书》卷 45《江充传》，第 2176 页。
[③]《汉书》卷 78《萧育传》，第 3290 页。
[④]《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第 2913 页。

前后十余辈。”[①]由此可知，汉使曾多次前往匈奴探察情况。他们在匈奴的某些活动，威胁到了匈奴的利益，所以对方采取扣留汉使的方式进行打击报复。无论汉匈处于战争还是和平时期，当然主要还是在战争和关系比较紧张时期，不少西汉使者出使匈奴，从事着探查并搜集匈奴情报信息的工作，可见西汉对匈奴一直都是比较谨慎的。

2、具体实施西汉的和亲政策。汉匈交往史上，不论是西汉前期国力弱于匈奴不得已而屈服之时，还是后期国力渐强开始笼络匈奴之际，都曾多次实施与匈奴和亲的政策，这是协调双方敌对状态的重要手段，正所谓“汉家长策在和番”[②]，“安危大计在和亲”[③]。在西汉与匈奴和亲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莫过于与匈奴缔结和亲协定和护送西汉“公主”前往匈奴和亲，而这两个环节往往是由西汉使匈奴的使者来操作的。

西汉早期，汉高祖就曾派刘敬与匈奴订立和亲协定。这项协定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会作一定的调整修订。匈奴不遵守时，和亲协定便被废弃，若以后双方关系缓和，出于需要，和亲协定往往又会被重续。这基本都是汉使给朝廷传递信息，朝廷作出决定后，再由他们前往调整、修订或重续协定。

西汉“公主”每次前往匈奴和亲都有和亲使者护送。

> 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④]。

> 老上稽粥单于初立，文帝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⑤]。

西汉使者，从汉匈之间和亲协议的达成，到最终护送公主出嫁匈奴，始终活跃在和亲活动中。签订和亲协议，关系到和亲将欲达到的效果；护送公主出嫁，则关系到和亲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后，会达到的实质效果。这两个重要环节由出使匈奴的汉使来操作，足见他们在西汉实施和亲政策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3、分裂匈奴势力，诱使匈奴内附。公元前 133 年到公元前 119 年，西汉军队大规模、长时间、远距离出塞反击匈奴。经过漠南战役、河西战役和漠北战役，匈奴连遭重创，“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⑥]。面对匈奴势力的每况愈下，西汉企图诱使匈奴内附，以图北部边疆的永久安定。这一时期，西汉前往匈奴的使者，开展了一些分裂匈奴势力，诱使其内附的活动。

伊稚晖单于（前 126—前 114 年）用赵信之计，遣使西汉，请求和亲。汉武帝向群臣询问对策，有的大臣主张和亲，有的主张争取使匈奴臣服，丞相长史任

[①]《汉书》卷 54《苏武传》，第 2459 页。
[②] 鲁歌等:《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05 页。
[③] 鲁歌等:《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第 215 页。
[④]《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第 2895 页。
[⑤]《汉书》卷 94《匈奴传上》，第 3759 页。
[⑥]《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第 2911 页。

敞认为“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武帝于是派遣任敞出使匈奴。任敞到匈奴后，游说单于向汉称臣，“单于闻敞计，大怒，留之不遣”[①]。乌维单于（前114—前105年在位）时期，“(汉）天子巡边，亲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风告单于”[②]。郭吉见到单于之后说：“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汉。何但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焉？”听完郭吉的话，单于大怒，“留郭吉不归，迁辱之北海上”[③]。儿单于（前105—前102年在位）初即位，“汉使两使者，一吊单于，一吊右贤王，欲以乖其国。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将致单于。单于怒而尽留汉使，汉使留匈奴者前后十余辈，而匈奴使来，汉亦辄留相当”[④]。

以上事件说明，这一时期，西汉频繁遣使匈奴，企图利用这些使者从匈奴内部寻找机会，制造矛盾，从而配合武装进剿，攻灭匈奴；而配合朝廷这一策略，汉使要冒很大风险，不少使者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严格地说，汉使做的这些事情，也不是身为使者所应该做的；但他们也是奉朝廷和皇帝之命出使，为的是谋求两国和平，使双方百姓免受长年战争之苦，故而他们在匈奴的这些活动也是值得肯定的。而匈奴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说明匈奴对于西汉派使者进行分裂其势力、诱使其内附的活动很注意防范。

4、协助朝廷远控匈奴，协调匈奴各方面关系。这一观点由李大龙先生提出。他认为甘露二年（前52年）后的匈奴呼韩邪单于部，是既没有被西汉纳入到郡县，又没有被纳入特设机构等管理体系中的一类藩属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例。而对这样的藩属，在它与西汉王朝正常交往的过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使者往来。使者直接受命于双方的最高统治者，是双方交往政策的执行者。匈奴成为西汉藩属后，西汉也曾向匈奴派出使者，这是对其实施远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些使者在匈奴的活动，主要服务于西汉远控匈奴并协调其各方面关系的目的。[⑤]由于甘露二年后，西汉在匈奴呼韩邪单于部没有设置管理机构，所以这一时期向匈奴派遣的使者，是西汉对匈奴藩属政策的主要实施者。匈奴成为西汉藩属后，相继出使匈奴，间接参与管理，并协助朝廷远控匈奴的使者有：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中郎将萧育、中郎将萧咸、副校尉萧由、右将军长史姚尹等。

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的出使，是西汉后期对匈奴呼韩邪部进行的比较重要的一次遣使行动。甘露三年（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朝正月完毕之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

[①]《汉书》卷94《匈奴传上》，第3771页。
[②] 事在公元前110年，参见《汉书》卷94《匈奴传上》，第3771页。
[③]《汉书》卷94《匈奴传上》，第3772页。
[④]《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15页。
[⑤] 参见李大龙：《西汉王朝藩属体系的建立和维系》，《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第132页。

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他们在领军护送呼韩邪单于北归之后，接受诏令"留卫单于，助诛不服"[①]。他们率领近两万余名兵士，驻扎匈奴，虽然名义上是保卫单于，帮助其铲除异己势力，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实际是对匈奴进行军事监控，是对匈奴内政进行干涉和控制。

此外，这一时期出使匈奴的汉使也注意协调匈奴内部以及匈奴和乌孙、乌桓等的关系，当然主要还是规范和协调汉匈之间的关系。元帝永光元年（前 43 年），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归呼韩邪单于侍子。韩昌、张猛"见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闻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恐北去后难约束"。于是，韩昌、张猛与匈奴单于、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歃血为盟。盟约内容为：

> 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②]

诸如此类的活动说明，西汉不断派往匈奴的使者，也担负着协调和规范双方关系的重任。

二 主要经济活动

匈奴是游牧部族，两汉之际，尚属于奴隶制社会。虽在公元前 3 世纪前后，匈奴进入铁器文化时代，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但总体而言，"与当时汉族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文化比较起来，相差很远"[③]，因此匈奴一直垂涎西汉的财物。

匈奴通过合法和非法两条途径来获得西汉财物。合法途径，是与西汉进行关市贸易和获得赠赐；非法途径是抢掠。其合法手段往往与西汉使匈奴使者有密切关系。进行关市贸易，是西汉与匈奴和亲协定的重要内容，而和亲协定一般是由西汉使者与对方缔结的。西汉朝廷为了笼络匈奴常常派使者到匈奴致赐，有时专门派使者前往，有时伴随着和亲、慰问等活动一起进行。西汉使者送往匈奴的物品主要有"絮缯酒米食物"[④]、衣物等。

三 主要文化交流活动

1、西汉使者与匈奴接待人员论辩，传播中国文化。西汉派许多辩士作为使者出使匈奴，他们到匈奴后的具体文化活动，在汉使与中行说的一次辩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 汉使或言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亲岂不

[①]《汉书》卷 94《匈奴传下》，第 3798 页。
[②]《汉书》卷 94《匈奴传下》，第 3801 页。
[③] 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1 页。
[④]《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第 2895 页。

自夺温厚肥美赍送饮食行者乎？”汉使曰：“然”。说曰：“匈奴明以攻战为事，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以自卫，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庐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妻其妻。无冠带之节、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父兄死，则妻其妻，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阳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到易姓，皆从此类也。且礼义之弊，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极，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攻，缓则罢于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喋喋占占，冠固何当！”自是之后，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毋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为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善而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乃稼穑也。”[①]

双方辩论的焦点是汉匈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这样的辩论有利于汉匈之间进行文化交流。但是，由于中行说是投降匈奴的汉使，熟知西汉派辩士到匈奴的目的，所以从匈奴的利益出发，他还试图阻止西汉的文化进攻策略，诘难汉使。

2、一些汉使在出使匈奴的过程中，为了维护本国尊严，特别讲求忠、孝、节、义，使得这些儒家思想在匈奴得到传播。例如，苏武在出使匈奴的过程中，面对种种威逼利诱，坚持民族气节，忠诚于祖国，持汉节 19 年不失，真正地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②]的大丈夫气概。苏武的节义，当时就对匈奴产生了一定影响。如苏武担心投降受辱，想以自杀来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结果自杀不成而身负重伤，匈奴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③]。苏武流放北海上五、六年后，仍对祖国坚贞不屈，单于弟於靬王“爱之，给其衣食。三岁余，王病，赐武马畜服匿穹庐”[④]。这说明汉使在使行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忠、孝、节、义等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匈奴人。

3、投降匈奴的汉使在客观上传播了中原文化。看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应宥于成见，如汉使中行说和卫律投降匈奴，当时看来是件极不光彩的事，为时人所不齿。直到现在多数人仍认为他们是十恶不赦的“汉奸”。 但宏观地来看，虽然他们的确曾试图阻碍西汉从文化上征服匈奴，在中华文明的传播史上，他们还是值得称道的。

匈奴氏族贵族对于氏族成员进行剥削的方式之一，就是征收赋税。随着赋税征收成为定制，征收方法日益要求精密，所以在匈奴老上单于时，中行说“教单

[①]《汉书》卷 94《匈奴传上》，第 3760 页。
[②]《孟子·滕文公下》。（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141 页。）
[③]《汉书》卷 54《苏武传》，第 2461 页。
[④]《汉书》卷 54《苏武传》，第 2463 页。

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①]。“疏记”是比较精密的计算和登记方法，用来稽核和征收人民的牲畜和财产。[②]中行说教匈奴人疏记，改进了匈奴原有的简单计算方法，有利于在匈奴中推广比较先进的经济管理模式。此外，中行说日夜为单于谋划，还教会了匈奴不少其他文化知识。

> 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牍，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以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长大，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③]

卫律也是投降匈奴的汉使。他在匈奴也很受重用，被封为匈奴的丁零王。壶衍鞮单于年少初立，匈奴内部分崩离析，常害怕汉军袭击。卫律为单于谋划“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于是将筑城、凿井等技术[④]传入匈奴。所以说投降匈奴的汉使在匈奴的活动，客观上促进了汉匈之间的文化交流。

第二节 西汉使者在西域的主要活动

一 主要政治活动

1、在西域寻求联合抗匈的同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都是为了寻求抗匈同盟。第一次，张骞以郎的身份持节出使，是寻求与大月氏结盟。然大月氏当时“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⑤]，无意与西汉联合。张骞在月氏一年有余，未能说服大月氏王，只好怏怏返汉。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是寻求与乌孙结盟。他率使团顺利到达乌孙，致赐之后，把武帝的意旨转告乌孙王：“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⑥]。但因为“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国分，不能专制”[⑦]，所以张骞虽经过一番努力，仍未达到目的。于是他便分遣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西域国家，自己则率随从和乌孙使者归国。

2、为统一西域搜集政治情报。最早为西汉统治者搜集有关西域政治情报的汉使，首推张骞。张骞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出使西域，不仅获得大月氏已无“报

[①]《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9页。
[②] 参见林幹：《匈奴通史》，第32页。
[③]《汉书》卷94《匈奴传上》，第3760页。
[④]《汉书》卷94《匈奴传上》，第3782页。
[⑤]《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58页。
[⑥]《汉书》卷96《西域传下》，3902页。
[⑦]《汉书》卷96《西域传下》，3902页。

胡之心”[①]的情报，而且还探悉乌孙“贪汉财物”[②]，故居敦煌、祁连间，兵强“不肯复朝事匈奴”[③]。正因为得到这些政治情报，方有西汉朝廷做出的和亲乌孙，建立双方联盟，共同抗击匈奴的决策。另如西汉出兵攻伐大宛前，“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即尽虏破宛矣”[④]。一定程度上说，这些情报的获得，直接促使西汉迅速讨伐大宛。

3、汉使在西域打击匈奴势力，铲除亲匈势力，扶植亲汉势力，为西汉统一西域做准备。例如，傅介子于元凤（前80—前75年）中，奉命出使大宛。他从大宛返还，到龟兹时，有人告诉他从乌孙回来的匈奴使者正在龟兹，于是“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诛斩匈奴使者”[⑤]。表明西汉使者曾直接打击匈奴在西域的势力。

元凤中，傅介子在出使过程中，获悉匈奴在一些西域国家有代理人，于是自请出使。元凤四年（前77年），朝廷派傅介子使西域，他带少数吏士来到楼兰，又以黄金锦绣为诱饵，引诱亲匈的楼兰王设宴招待他。楼兰王酒醉，傅介子以与楼兰王私下会谈为借口，骗楼兰王屏退左右随他进入后帐，后帐预先埋伏的两名壮士，持刀从背后刺死了楼兰王。然后，傅介子又立楼兰王安归的弟弟尉耆为王，他此前在汉做过质子，所以亲汉。[⑥]

甘露元年（前53年），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⑦]。西汉派遣破羌将军辛武贤领兵到敦煌，准备讨伐乌就屠。都护郑吉派解忧侍者、乌孙右大将妻冯嫽“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来劝说乌就屠，乌就屠惧怕，表示：“愿得小号。”[⑧]宣帝征召冯夫人问明情况，然后派冯夫人锦车持节，出使乌孙，招乌就屠诣常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以上事件说明，西汉时期，出使西域的使者，在西汉和匈奴争夺西域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为西汉统一西域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二 主要军事活动

在西汉逐步统一西域的过程中，由于特殊形势的需要，加之当时使者群体中多勇武人才，所以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者，也直接参与了一些军事行动。

昭帝时，西汉派往西域屯田轮台的校尉赖丹被龟兹杀害。地节元年（前69年），西汉派常惠出使西域，常惠集合西域诸国之兵围攻龟兹，龟兹王投降。这为此后西汉在轮台、渠犁一带屯田，在乌垒城建立西域都护府打下基础。

元康元年（前65年），亲匈的前莎车王弟呼屠徵在匈奴支持下，联合其他国家杀死西汉所拥立的莎车王万年及汉使者奚充国，并扬言西域北道各国已属匈

[①]《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58页。
[②]《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8页。
[③]《汉书》卷61《张骞传》，第2692页。
[④]《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4页。
[⑤]《汉书》卷70《傅介子传》，第3001页。
[⑥] 参见《汉书》卷70《傅介子传》，第3002页。
[⑦]《汉书》卷96《西域传下》，第3907页。
[⑧]《汉书》卷96《西域传下》，第3907页。

奴，并且还“攻劫南道，与歃盟畔汉”，鄯善以西的通道被隔断。其时，适逢宣帝派往大宛的汉使冯奉世，率使团行至鄯善国伊循城，冯奉世认为“不亟击之则莎车日强，其势难制，必危西域”。为了维护西汉在西域的既得利益，冯奉世决定发动西域诸国进攻莎车。之后，他率西域南北道各国兵 1500 余人，由南北道夹攻莎车城，顺利地平定莎车之乱。莎车一战，“诸国悉平，威振西域”。[①]大宛贵人听说冯奉世诛斩莎车王，平定了莎车之乱，对他异常尊重。

车师一直是西汉在西域争夺的重要地区之一。宣帝地节二年（前 68 年），汉遣侍郎郑吉等率领免刑罪人屯田渠犁，垦田积谷，准备向车师发起又一次进攻。秋收之后，郑吉发动城郭诸国兵 3 万余人和田卒 1500 余人，共击车师，车师王降汉。匈奴发兵来攻，被郑吉等击退。匈奴又拥立原车师王的弟弟兜莫为车师王，把车师移民全部聚拢向东迁移。郑吉继续屯田渠犁，分兵 300 人屯田车师。这是汉使在西域屯田过程中，对比较靠近匈奴的西域国家发动的军事进攻。

以上事件均为西汉使者在西域采取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基本上都是为打击亲匈的西域国家，从而维护西汉在西域的既得利益。

上述西汉使者出使西域的初衷，未必是直接到西域去从事军事活动，有时是在出使过程中，由于临时特殊需要而采取的军事行动。这和当时西汉与西域关系的特殊性以及当时出使西域的使者多武将出身都有一定关系。

三　主要经济活动

1、搜集经济情报。西汉时期，中原与西域开展了大规模的商品贸易活动，但由于中原距离西域非常遥远，加之沿途艰难险阻重重，所以经济信息交流不畅。因此汉使到西域后，很注意搜集与双方贸易活动有关的经济情报。如张骞在大夏时，看到中国邛山（今四川荥经西）的竹杖和蜀地的细布在市场上出售，很是惊奇，于是向商人打听，才知是从身毒买来的。再如汉使曾对武帝说：“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②]。可见大宛的贰师城有良马，也是汉使带回的经济情报。

2、从事商品交换。西汉打通西域，除了政治、军事动机之外，也迎合了当时中西方渴望进行物资交换的愿望。一些出使西域的西汉使者，主要承担着政治任务，捎带从事一些赏赐、馈赠任务。比如张骞出使西域，除担当着联合大月氏、乌孙等国实现“断匈奴右臂”[③]的政治任务外，还携带了大量的牛羊、缯帛和黄金，与他的副使到西域各地馈赠交换。

还有一些使者，他们出使主要就是为了经济利益。西汉时期，特别看重西域

[①]《汉书》卷 79《冯奉世传》，第 3294 页。
[②]《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4 页。
[③]《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0 页。

良马，因此曾派出大批使者到西域求马。

> 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①]

这些使者出使西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以西汉的财物换回西域的良马。交换若顺利实现，则有利于加强双方的友好关系；否则，双方关系可能会恶化。如壮士车令到大宛贰师城求马未遂，就造成西汉与西域关系的紧张。“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但大宛不肯给汉使宝马，于是“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汉使的不满，又引起大宛贵人的不满，于是他们“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②]这个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为震怒，立即征发属国兵6千骑以及郡国青壮兵丁数万人，派李广利率兵远征大宛。

汉代的使者每到西域一国，无论公务还是经商，都必须携带足够的钱财物品，因为他们在那里“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些西域国家认为他们“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③]

西汉与西域交易的物品主要为丝绸、漆器，其次还有金银、布、盐以及西域的马、牛等牲畜。交易得以实现，除得益于双方专门从事贸易交换的商人外，也有双方频繁往来的使者的功劳。

3、参加屯田积粟。随着西汉与西域之间使者往来的日益频繁及西汉在西域势力的日渐强大，为了保证中西交通路线的畅通，保障来往行人的食宿，减轻西域当道诸国沉重的负水担粮负担，西汉曾在西域大面积屯田。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者，有些参与了屯田积粟工作。见于史书记载且比较著名的如郑吉、常惠等人。参与屯田的使者，在屯田过程中，担当着领导屯田的任务。

四　主要文化交流活动

1、将西汉先进的技术传入西域。汉代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有很多方面在当时世界处于“执牛耳”地位。两汉时期传入西域的比较重要的技术，是制作铁器和凿井技术。这些技术西传和汉使有一定关系。

>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④]。

2、为维护本国尊严，讲求礼仪，传播了汉文化。在西汉与西域交往过程中，

[①]《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0页。
[②]《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4页。
[③]《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3页。
[④]《汉书》卷96《西域传》，第3896页。

西汉一直坚持自己的尊贵地位，并通过使者来强调和保持这种地位。因此汉使到西域一些国家后，围绕代表双方等级身份的交聘礼仪问题，有过所谓的“礼仪之争”，即西汉使者坚持让西域国家的王遵守大汉礼节，拜见汉使，以此来保持大汉的尊严，宣扬大汉的国威。关于这方面的详细内容将在后文“西域诸国接待汉使的礼仪管窥”这一问题中详细介绍，这里暂不赘述。在这样的“礼仪之争”过程中，汉朝的思想文化，在西域得到比较广泛、深入的传播。

第三节 匈奴及西域各国接待西汉使者的情况

一 接待礼仪

西汉向匈奴和西域遣派的使者，一定程度上是西汉皇帝的代表，“秦汉的使者恰似现行的外交代表制的初期，使者不是代表国家或政府，而是代表皇帝个人”[①]。而使者本人一般也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他们或具有较高职位，或为皇帝身边的近臣。因此匈奴和西域各国，应该相应地有一些接待西汉使者的礼仪规范，但是由于史料缺乏，无法详述这方面的情况。现就史书中的零星史料，略述之。

1、匈奴接待汉使的礼仪管窥

元封元年（前 110），汉武帝巡边，遣使者郭吉讽告匈奴单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郭吉卑体好言曰：‘吾见单于而口言’”[②]，这才得以面见单于。武帝元封四年（前 107 年），“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庐。单于爱之，详许甘言，为遣其太子入汉为质，以求和亲”[③]。王乌回国后，西汉又向匈奴派出了史臣杨信。杨信至匈奴，“单于欲召入，不肯去节，单于乃坐穹庐外见杨信”[④]。

由此看来，汉使到匈奴后，一般先由主客接待。主客，颜师古注曰：“主接诸客者也。问以何事而来。”[⑤]主客通过接待来使，了解他们的使行目的后，再决定是否让他们面见单于。主客这一关是非常重要的。上述汉使郭吉，为了通过主客这一关，不得不“卑体好言”。而郭吉见到单于后，由于言辞过于激烈，因此“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⑥]主客引见了不受单于欢迎的汉使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说明主客所担当责任重大；同时也说明通过主客这关很不易。

西汉使者在征得主客同意，面见单于时，要按匈奴习俗，“去节”、“黥面”，

[①] 沈巨尘、陶希圣：《秦汉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33 页。
[②]《汉书》卷 94《匈奴传上》，第 3771 页。
[③]《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第 2913 页。
[④]《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第 2913 页。
[⑤]《汉书》卷 94《匈奴传上》颜师古注，第 3771 页。
[⑥]《汉书》卷 94《匈奴传上》，第 3772 页。

方可入穹庐见单于。而如果不按匈奴习俗做，只能在穹庐外见单于。这种“去节”、“黥面”习俗，一方面，可能跟匈奴的习俗有关；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匈奴故意侮辱汉使。张骞使至西域乌孙时，昆莫也企图效仿匈奴，让张骞遵从此礼节，张骞深感惭愧。可见，汉使对遵从匈奴这一习俗备感受辱。

匈奴分裂以后，南匈奴内附，其接待汉使的礼节，大概是实行“拜”的方式。汉成帝时，匈奴听说康居不拜汉使，认为“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甚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①]。这里颜师古注曰“言单于见康居不事汉，以之为高，自以事汉为太卑，而欲改志也。”[②]匈奴听说康居使者不拜汉使，便欲改变他们卑下地对待西汉的方式。由此看来匈奴接待汉使可能采取的是“拜”的礼节。

2、西域诸国接待汉使的礼仪管窥

西汉统一西域之前，西域诸国曾一度在匈奴的统治之下。受匈奴影响，西域一些国家曾欲效仿匈奴单于接待汉使的礼节，汉使与之有过所谓的“礼仪之争”。如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至乌孙时，“昆莫见骞如单于礼”[③]。这里颜师古注曰：“昆莫自比于单于。”[④]也就是说，昆莫欲效仿单于，要求张骞“去节”、“黥面”见他。听完乌孙昆莫的要求之后，“（张）骞大惭，谓曰：‘天子致赐，王不拜，则还赐。’昆莫起拜，其它如故”[⑤]。由此可见，乌孙昆莫虽欲效仿匈奴单于接待汉使的礼节，但最终面对西汉丰厚的物质利益诱惑，在礼节上向西汉屈服，采取了向西汉使者“拜”的礼仪方式。在西汉准备统一和统治西域阶段，这样的礼仪之争，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西汉与西域一些比较有实力的国家交往过程中。其最终结果，一般是在西汉强大军事力量的威慑和丰厚物质利益的诱惑面前，西域国家向西汉屈服，采用尊重西汉及其使者的“拜”的礼节。乌孙是西域比较大的国家，尚且向西汉屈服，其他的西域国家也大概如此。在西汉统一西域进入管辖阶段后，西域诸国对西汉使者也应是采取“拜”的方式。

在西汉使者与西域国家接触的过程中，也曾受过较高规格礼仪的接待。武帝遣使到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⑥]。解忧公主和汉使谋刺狂王事件发生后，西汉派使者前往医治慰问，使者回国时，乌孙狂王也曾亲自送别。“副使季都别将医养视狂王，狂王从十余骑送之”。[⑦]

但是，即便在西汉统治西域时期，一些离西汉较远的康居之类的西域国家，仍对西汉使者不敬，接待礼仪甚为傲慢。汉成帝时，都护郭舜曾经上书言：

[①]《汉书》卷 96《西域传上》，第 3892 页。
[②]《汉书》卷 96《西域传上》颜师古注，第 3892 页。
[③]《汉书》卷 96《西域传下》，第 3902 页。
[④]《汉书》卷 96《西域传下》颜师古注，第 3902 页。
[⑤]《汉书》卷 96《西域传下》，第 3902 页。
[⑥]《汉书》卷 96《西域传上》，第 3890 页。
[⑦]《汉书》卷 96《西域传下》，第 3906 页。

……而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甚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①]

可见，一些离西汉较远的西域国家，始终不想轻易屈从西汉的统治，故而在接待汉使的礼节上，显得傲慢无礼。这激起西汉边吏的不满，他们建议放弃与这些国家的交往。

二　翻译配备

"汉代突破了先秦外交基本上是在'东亚外交圈'范围内进行的局限而大为拓展，而这一突破引起了汉代外交态势与难易程度的一系列变化。"[②]西汉时期，外交圈迅速扩展，不仅与"东亚外交圈"中属于异文化圈的匈奴建立起外交关系，而且外交关系还发展至"西域外交圈"中的诸文化圈国家。外交圈扩大，导致西汉使者出使时，会有语言、文字交流方面的困难，增加了他们从事外交活动的难度，因此汉使与异文化圈中民族和国家的交往，需要迂回曲折地进行，有时甚至需要经过多重中介，即所谓"重译"才能进行，所以史书中有"重九译，致殊俗"[③]的说法。针对外交圈扩大而带来的语言、文字交流方面的困难，一方面西汉在派出使团时，会配备译者作为随员；另一方面使者到出使国后，对方也会派译者帮助沟通。

1、匈奴方面相关的翻译配备

匈奴是战国以前，以荤粥、鬼方、猃狁、戎狄等称名的北方部族的后代。匈奴称雄于蒙古草原，深受中原和西亚文化影响，文化习俗十分复杂。一般认为匈奴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但究竟属该语系的蒙古语族还是突厥语族，尚无定论。[④]据文献考察，目前还没有发现匈奴人有自己文字的证据，现存考古资料中也没有发现肯定的物证。[⑤]考察这样一个语言背景复杂、文字基础简单的古代民族与西汉交往过程中的翻译活动，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秦汉之际，匈奴曾一度称雄蒙古高原，并统治西域，抗衡中原。匈奴在与中原王朝以及西域诸国交往的过程中，由于语言分属不同语系，需要大批译者进行沟通。但是，由于匈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难于考证匈奴译官的设置情况。值得庆幸的是，汉代中原王朝与匈奴接触频繁，因此从当时中原王朝的史书记载中，可以找到有关匈奴的零星史料，来考察当时匈奴译官设置的情况。《汉书·百

[①] 《汉书》卷96《西域传上》，第3892页。
[②] 黎虎：《汉代外交使节的人选》，《人文杂志》，2003年第6期，第103页。
[③]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6页。
[④] 参见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⑤] 参见林幹：《匈奴通史》，第166页。

官公卿表》中提供的一条材料可以佐证匈奴治下翻译机构的存在。汉武帝时，匈奴浑邪王归附，汉朝为这部分归附的匈奴人设了五个属国，属国官员中有译官的设置，专事翻译。[①]既然是译令，应该有下属，由此推知匈奴存在一个颇具规模的翻译机构和翻译队伍。

西汉使者到匈奴后，匈奴在接待汉使时的翻译情况，文献少有记载。在分析有限史料的基础上，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匈奴在接待汉使时的翻译工作，曾得到流落匈奴的汉人的帮助。如，汉文帝时，陪公主出塞和亲的使者——宦者中行说，被迫出使匈奴后，归降匈奴。他本来通汉俗、汉语，在匈奴又渐渐懂得匈奴俗、匈奴语，单于十分宠信他，曾派他参与接待汉使的活动。接待汉使过程中，他多次同汉使进行辩论。另外，投降匈奴的汉使卫律、汉将李陵等流落匈奴的汉人，也曾参与接待汉使的工作。如始元六年（前 81 年），汉昭帝派遣李陵的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前往匈奴招回李陵，“立政等至，单于置酒赐汉使者，李陵、卫律皆侍坐”[②]。

虽然中行说、李陵、卫律等流落匈奴的汉人接待汉使时，都不仅仅是充当翻译，但是因为他们兼通胡汉风俗及语言，所以从事双方的沟通工作是顺理成章的。

2、西域诸国相关的翻译配备

由于地理原因，西域诸国与中原地区长期隔绝，号称“绝域”。因此西域诸国居民与中原居民判然不同，西域诸国的语言与中原地区也迥然有异。20 世纪初叶以来，欧洲语言学家通过对西方探险家从中国新疆，特别是塔里木盆地盗掘的各种木牍、文书、贝叶经文以及古币上的文字进行研究，发现西域各个绿洲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是不一样的。比如焉耆、龟兹一带通行一种婆罗迷字母斜体书写的文字，所表述语言属印欧语系，称吐火罗语或焉耆——龟兹语；和田一带通行一种婆罗米字母直体书写的文字，所表述的语言属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称和田塞语；鄯善一带通行用阿拉美字母书写的文字，称佉卢文……当然，这里所讲的赖以鉴别西域诸国语言的考古文物，所使用的时间可能晚于西汉，但一个民族使用一种语言或者采用一种书写文字，应有一定原因和延续性，因此这种晚出的语言文字材料，对认识汉代居民以及这些居民所使用的语言，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③]由晚出的语言文字材料，不难推断出汉代西域诸国语言极为复杂，与中原语言差异很大，这必将给中原与西域交流带来很大不便。西汉时期，尤其是张骞“凿空”之后，西域各国与中原地区的来往更加频繁，从而带动与之相适应的翻译工作也进一步发展。

西域诸国在汉初曾役属匈奴并相互通使，张骞通西域后，西域诸国与西汉交

[①]《汉书》卷 19《百官公卿表上》，第 735 页。
[②]《汉书》卷 54《李陵传》，第 2458 页。
[③] 参见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5 年版，第 78 页。

往频繁，而且西域诸国语言也不尽相同，因此西域诸国之间及其与匈奴、西汉交往时，都需要借助翻译。西域诸国对翻译工作比较重视。西域诸国中凡地处南北交通线要道者，或人口众多者，均设译长一职。关于“译长”的职责，《西域翻译史》、《中国口译史》等书中，都认为其职责当是从事翻译工作，笔者也赞同这种观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西域各国所设译长人数不一。各国的译长人数，当是视国之大小和地理位置重要与否而定。西域诸国译长设置情况见下表：（此表据《汉书·西域传》列出）。

表 1：西域诸国译长设置情况一览表

国名	译长人数	国名	译长人数
婼羌		姑墨	2
鄯善	2	温宿	2
且末	1	龟兹	4
小宛		乌垒	1
精绝	1	渠犁	
扜弥	2	尉犁	2
于阗	1	危须	1
皮山	1	焉耆	3
乌秅		乌贪訾离	
西夜		卑陆	1
蒲犁		卑陆后	1
依耐		郁立师	1
无雷		单桓	1
莎车	4	蒲类	
疏勒	1	蒲类后	1
尉头		东且弥	
乌孙		西且弥	
劫国	1	车师后国	1
狐胡国		车师都尉国	
山国	1	车师后城长国	
车师前国	2	戎卢	

据上表统计，《汉书·西域传》共记载了 36 位西域国家的译长，除此以外，还有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登记在册的译长人数，可能还有一些译长的属官，以及诸

国的地方翻译人员等。这样看来，西域的翻译机构和翻译人员队伍颇具规模，反映出西域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西域各国在人员和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对中西交流贡献不菲。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途经匈奴时，他不幸被匈奴扣留，脱逃后途经大宛国。史书记载：

> 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译道，抵康居。[①]

这里的"道"，颜师古注曰："道读曰导。"[②]这段史料表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大宛曾专门他派翻译人员，引导他顺利抵达康居。西汉第二次派遣张骞以中郎将身份出使西域乌孙，史书记载：

> 骞既至乌孙，致赐谕指，未能得其决。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乌孙发译道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于是西北国始道通于汉矣。[③]

这段文字记载张骞希图联合乌孙以孤立匈奴。起先，乌孙对汉朝是否强大缺乏了解，不敢贸然背弃匈奴，于是派遣兼做翻译和向导的人员送张骞和回访汉朝的乌孙使者。关于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史书记载如下：

> 介子与士卒俱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④]

史料讲述西汉使者傅介子利用楼兰译者所起的中介作用，诱骗楼兰王与之相见并将他刺杀的事。

上述 3 件事中提到的"译"，可能是上文所说的"译长"，也可能是"译长"的下属官员，总之当是大宛、乌孙及楼兰国的翻译人员。诸如此类的西域诸国翻译人员，在西汉使者出使西域活动中，起到翻译沟通兼向导的双重作用。傅介子利用楼兰译者诱杀楼兰王一事，则说明他们对汉使的使行活动，有时会起十分关键的作用。

[①]《汉书》卷 61《张骞传》，第 2688 页。
[②]《汉书》卷 61《张骞传》颜师古注，第 2688 页。
[③]《汉书》卷 61《张骞传》，第 2692 页。
[④]《汉书》卷 70《傅介子传》，第 3002 页。

第四章　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的影响及特点

第一节　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的影响

一　积极影响

1、使者使行活动的影响

（1）使行匈奴活动的影响

首先，对双方之间政治关系的基本走向，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在汉匈之间第一个对立时期，西汉使者出使匈奴，侦察并获取对方情报，有效地协助西汉退出了战争重围，这是汉匈关系步入和亲阶段的基本保证。

在汉匈和亲时期，西汉使者缔结汉匈和亲协定，参与和亲活动，缓和了双方间的紧张关系，为谋求汉匈总体对立态势下的暂时和平，作出贡献。武帝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所凭借的强大国力，是在这段暂时的和平环境里，通过休养生息赢得的，可见西汉使者的活动对汉匈之间由和亲走向对抗也发挥了一定作用。笔者没有夸大这种作用的意图，只是强调西汉使者所起到的一些间接性影响。

在汉匈之间第二个武力对抗时期，西汉大规模出击匈奴，对方元气大伤之后，西汉使者仰仗本国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试图说服单于为外臣，朝请于边，促使汉匈建立起臣属关系。甘露三年（前 51 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接受西汉册封，正式归附。这主要与西汉对匈奴大规模武力征伐后，匈奴内外交困的状况有关，也同西汉使匈奴使者的努力分不开。长期以来，这些使者在匈奴从事了大量的政治活动，诸如探查匈奴动静，搜集情报信息；具体实施西汉的和亲政策；分裂匈奴势力，诱使匈奴内附等。正是这些政治活动促使了匈奴的内附。

匈奴成为西汉藩属后，西汉使者协助朝廷远控匈奴、规范协调汉匈关系，并帮助其协调其他各方面关系，从而保持和维系了汉匈间的臣属关系。

其次，促进了汉匈之间的物资交流。在汉匈交往过程中，“匈奴总是以采取各种方法，更多地从中原各地获取经济物资为其出发点，兄弟之约、和亲之请、武力掠夺，使臣交往等等万变不离其宗。而中原居民也离不开对耕畜、皮毛、乳肉食品等的依赖”。[①]正因为汉匈相互需要对方的经济物资，所以双方很多活动都是朝着有利于经济物资交流的方向开展的。穿梭来往的双方使者是从事经济物资交流的主要群体之一。西汉使者从和亲时送往匈奴大量陪嫁物资，到代表朝廷向匈奴致赐，再到专门从事汉匈间的物资交换，无一不是基于促进汉匈经济物资交流的目的，而这些活动也的确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①] 王庆宪：《匈奴与西汉频繁密切的使节往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第 80 页。

再次，促进了汉匈间的文化交流。西汉早期，刘敬在其和亲建议中，就强调指出汉匈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并提出“使辩士风谕以礼节”[①]的建议。后来，西汉也的确派许多辩士作为使者出使匈奴。西汉实施这项措施，其意图就是希望通过大量能言善辩的汉使在匈奴进行文化交流活动，使中原的先进文化在匈奴广泛传播，从而用其文化优势来改变对方文化，最终达到同化目的。西汉使者曾经围绕汉匈文化孰优孰劣问题，与匈奴进行过多次辩论，虽然表面上各执己见，难以相服，但是这种辩论活动，必将有利于双方的文化交流。

最后，汉使在维护本国尊严的同时所体现出的忠、孝、节、义等儒家思想，也促使中原文化在匈奴广泛传播。

此外，投降匈奴的汉使，虽然为人所不齿，但从文化交流方面来看，他们对汉匈文化交流起到非常直接的促进作用。

（2）使行西域活动的影响

第一，打破了中原与西域的隔绝状态。西汉初年，匈奴控制西域，阻塞了中原与西域的交往。张骞“凿空”，“西北国始通于汉”，[②]打破了因匈奴强盛而造成的中原与西域的隔绝状态。后来的汉使，踏着张骞的足迹，继续跋涉于通往西域的古道上。张德芳先生在全部悬泉汉简中检索出有关西域的资料 360 多条，皆为邮驿文书。他在《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一文中，对这些简文进行了考释。这些邮驿文书，记述了主客方使团行经沿途诸处食宿供应各方面的情况，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张骞通西域后，汉与葱岭东西诸国的交往活动的认识。张德芳先生研究发现，这些简文涉及到的西域国家有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蒲犁、皮山、大宛、莎车、疏勒、乌孙、姑墨、温宿、龟兹、仑头、乌垒、渠犁、危须、焉耆、狐胡、山国、车师等 24 国。一些重要西域国家与汉的来往，在这些简文中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此外，还有一些诸如祭越、钧耆、折垣等过去未曾知晓的国家，简文中也有涉及。其中，大部分是有关汉使与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于阗、疏勒、精绝、扜弥诸国使者往还的内容。[③]张德芳先生的研究，很好地体现了西汉与西域诸国之间交往频繁，双方使者前后相继的盛况。

第二，为西汉最后击败匈奴创造了条件。西汉通西域的首要政治目的，就是为抗击匈奴寻找军事同盟。以张骞为代表的西汉使者，跋山涉水远赴西域，他们在西域的政治活动，宣扬了西汉的国威，使得西域诸国逐渐向西汉靠拢，并与西汉结盟，共抗匈奴。西汉出使西域的冯嫽、常惠等使者，又通过他们的活动，进

[①] 《汉书》卷 43《娄敬传》，第 2122 页。
[②] 《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69 页。
[③] 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7 页。

一步保持并巩固了双方的同盟关系。抗匈联盟的建立与巩固，为最后西汉击败匈奴创造了条件。

第三，为西汉统一和统治西域做出了贡献。张骞出使西域寻求抗匈军事同盟的目的虽未达到，但他本人及其副使较为成功地促使西汉与西域诸国开始建立起联系。此后，双方来往越来越频繁，西汉开始逐步向西域扩张。在西汉统一西域阶段，也就是公元前 104 年李广利西伐大宛至公元前 59 年西域都护设立，西汉与匈奴为争夺控制西域权进行了激烈斗争。这一时期，西汉使者打击匈奴在西域的势力，铲除西域各国的亲匈势力，扶植西域各国的亲汉势力，对西汉夺取西域给予了大力协助。西域都护设立，西汉政府全面正规地对西域行使主权阶段开始。在此阶段，西汉使者配合本国政府统治西域，为协调双方关系，继续发挥了作用。

第四、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西汉使者，作为从事中西交流的主体之一，他们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出使西域，多携带许多贵重礼物。如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携带“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①]张骞之后的汉使一度曾“所賫操大放博望侯时”[②]。丝绸是中原传往西域的主要物品。英国学者斯坦因言：“中国出品中为使臣携至西方者以细丝为最著。”[③]除丝绸外，中国的漆器、铁器等物品也在汉代传入西域，而且中原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此时也渐传西域。这大多直接和间接地与汉使有关系。

经济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西汉使者从西域返国时，也将西域的农作物、良马、毛织品、葡萄、苜蓿等物品或物种带回国。例如，《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 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④]

王桢《农书》载：“胡麻，即今之油麻是也，汉时张骞得其种于胡地，故曰之胡麻。[⑤]”据《博物志》记载，由张骞引入的物种尚有大蒜、安石榴、胡葱、胡荽、黄蓝等。如此多物品或物种的传入归功张骞，应当有悖历史真相。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因为张骞是开通西域的首位功臣，极出名，而当时他也的确带回一些物品、物种。当时和以后来往于西域的汉使、商人、军卒等，虽然也带回许多物品和物种，但是由于这些人得以来往于中原与西域之间，与张骞开通西域有很大关系，加之他们又多不出名，故而人们就将这些功劳统统算在张骞头上。究竟这么多物种传入该归功何人，姑且不论。人们将这些功劳统统归功首位使西域的汉使张骞，

[①]《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68 页。
[②]《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0 页。
[③]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引自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 63 页。）
[④]《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3 页。
[⑤] [元]王桢著，王毓瑚校：《农书》卷 7，农业出版社 1981 版。

最起码说明一点：传入这些物品、物种的过程中，或者笼统说，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西汉使西域的使者，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使者出使回国后的活动及其影响

(1)担任外交官员，继续为西汉外交做出贡献。西汉使者出使回国后，担任外交官员，继续致力于西汉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交往，为西汉外交做出了贡献。

西汉时期，诸卿之一的大鸿胪是主要的外交主管机构，大行令是大鸿胪的主要属官，汉初承秦称行人，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改称为大行令。数次出使西域的张骞和王恢，在出使回国后，均曾担任大行令一职。

> 将军张骞，以使通大夏……其后使通乌孙，为大行而卒，冢在汉中。[①]
>
> 大行王恢，燕人也，数为边吏，习知胡事。[②]

他们在外交工作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汉武元光元年（前134年），雁门马邑豪帅聂壹通过大行王恢向武帝建议："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③]次年春，就与匈奴和还是战的问题，武帝亲自召开会议，召问公卿。会议上，以大行王恢和御史大夫韩安国为代表，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派。大行王恢主抗战，御史大夫韩安国则主和亲，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执不下。最后汉武帝亲自定夺，采纳王恢的建议。

"典属国是与大鸿胪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官职。这个官职也是秦朝所置，西汉建立后继续设置。这是以民族事务为主而兼有外交事务的职官。典属国也是诸卿之一。"[④]出使匈奴的苏武及以出使西域乌孙闻名的常惠，曾先后担任汉廷典属国一职。苏武"使匈奴，留单于庭十九岁乃还，奉使全节，以武为典属国"[⑤]。如淳认为苏武担任这一官职，正是因为"其久在外国，知边事，故令典主主诸属国。[⑥]。后来常惠代替苏武做典属国，也是因为他"明习外国事，勤劳数有功"[⑦]。

由此可见，一些出使匈奴和西域的汉使，由于其在出使期间显示出杰出的外交才能，又因为其常年出使，对边事比较熟悉，加之西汉的边患主要是匈奴和西域，而这些使者正好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他们回国后，被任命为西汉重要的外交官员，继续为西汉外交出谋划策，辛苦忙碌，在西汉外交战线前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他们常年出使域外，所以较之于一般外交官员，他们更加了解边疆以及其他民族、国家的情况，即所谓"知边事"、"明习外国事"，所以他们提出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比较切合当时边事、外交的实际情况。

(2)接受皇帝垂询，为西汉的外交事务出谋划策，协助朝廷做出外交决策。

[①]《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2944页。
[②]《史记》卷108《韩长儒列传》，第2861页。
[③]《汉书》卷52《韩安国传》，第2398页。
[④]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⑤]《汉书》卷7《昭帝纪》，第223页。
[⑥]《汉书》卷7《昭帝纪》颜师古注，第223页。
[⑦]《汉书》卷70《常惠传》，第3005页。

西汉皇帝做出外交决策时，常咨询一些熟悉外事的人员，而外交使者就是接受垂询的上好人选，所以他们常常被皇帝垂询。例如，和亲是西汉实施的著名的外交政策。探察历史，不难发现，西汉无论对匈奴，还是对西域实行这项政策，均始于出使该地的使者回国后向皇帝提出的建议。西汉初年，匈奴严重威胁汉边。汉七年（前 200 年）抗击匈奴的战争失败之后，汉高帝苦谋对付匈奴的策略，于是向曾经出使并正确地探察出匈奴实际情况的刘敬征询计策。刘敬之所以被征询，就是因为他曾出使匈奴，洞悉其内情。刘敬依据汉匈双方的情况，认为不能以武力解决问题，要采取图谋长远的计策，方有望成功对付匈奴，于是他提出一套独特的解决汉匈矛盾斗争的策略，也就是著名的和亲政策。这对于汉匈关系，有深刻影响。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回国后，武帝带着极大兴致，不止一次向他了解西域的情况。张骞向武帝汇报情况时，乘机提出主要是针对西域乌孙国的和亲建议，这是因为乌孙是西域大国，乌孙的向背，对西汉与匈奴的斗争有战略性意义。张骞的建议促使西汉与乌孙成功结盟，共抗匈奴。所以说出使回国后，张骞仍对西汉外交做出了重要贡献。

> 是否具有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或实践经验。对于外交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决策集团成员，特别是其核心成员不可能对于外部世界都有深刻的了解，更不必说实践经验了，因而在汉唐外交决策中，经常吸收具有对外部世界知识或实践经验的人员参加决策会议，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①]

多次出使匈奴、西域的使者，对外部世界一般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具有关于外部世界的丰富知识，以及外交知识和经验技巧，所以他们返国后，皇帝常常亲自进行垂询，为做出符合本国利益的外交决策做准备。而由以上所举实例来看，多次出使，并且在出使期间表现优秀的使者，在接受皇帝垂询时提出的外交建议，是比较切合当时实际的，也往往被朝廷采纳并据之制定出相应的外交政策。可见部分汉使回国后，作为被咨询对象，仍继续默默地为西汉外交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经验技巧。

(3)因熟知路径，领兵带路，协助大军进行对外战争。西汉时期，到匈奴和西域，尤其是到西域的道路，不仅遥远，而且沿途险阻重重，水草乏绝，因此，无论与匈奴还是与西域国家作战，找熟悉路径的人领兵带路，顺利到达作战地点，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有些汉使回国后，就被指派领兵带路，协助西汉主力大军进行对外战争。例如，因为张骞熟悉去西域和匈奴的道路，熟知关于西域和匈奴的各种地理常识，所以他出使回国后，被遣派参与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的战争。他“导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②]从而立大功。汉使王恢，因数次出使

[①] 黎虎：《从汉唐外交决策看外交决策的特殊性》，第 90 页。
[②]《史记》卷 1《卫将军骠骑列传》，第 2929 页。

西域而对其地理形势等情况比较熟悉。元封三年（前 108 年）武帝派赵破奴攻破西域楼兰、姑师时，“发兵令（王）恢佐破奴击破之”。王恢在这次战斗中也立下大功，被封为“浩候”。[①]由此可见，使匈奴、西域使者归国后，不仅在协助朝廷制定对外政策方面有很大贡献；同时在领兵带路，协助主力大军成功作战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3、使者的精神及其影响

(1)坚韧不拔、不畏艰难、勇于开拓的精神，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出使西域的全部行程中，最为艰难的有两段，一段是穿越白龙堆，另一段是翻越葱岭。从玉门关和阳关以西一直到罗布泊，高大的沙梁蜿蜒纵横，沙土发白，这就是白龙堆。晋代高僧法显描写这儿的景象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②]。翻越葱岭一段更为艰苦。唐代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他经过这里时的情况：

> 山谷积雪、春夏合冻。虽时消泮，寻复结冰。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多暴龙，难凌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声叫唤，微有违犯，灾祸目睹。暴风奋发，飞沙雨石，过者丧没，难以全生[③]。

难以想象，张骞和其随从以及西汉时期其他出使西域的使者，是以何等坚韧不拔的意志来身历这段艰难行程的。张骞出使西域时，因为丝绸之路还没有正式开通，所以不仅路途艰险，而且沿途食宿也没有保障。出使行程中，张骞有时候就靠善射的随从堂邑父猎取飞鸟和野兽充饥。而张骞一生，居然两度身历这样艰难的旅程，其精神真使人不得不发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④]之叹。明代思想家李贽在《藏书》中写道：“张骞持汉节入匈奴，十三年而不失，与苏武何异？”[⑤]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分析了张骞两次被俘，两次逃脱以及穿越沙漠、高山的惊险经历后，慨叹说：“是骞之崎岖险阻，更甚于武也”[⑥]。正是在张骞坚韧不拔、不畏艰难、勇于开拓精神的感召下，西汉涌现出一批优秀使者。他们为后世出使外国者树立了光辉典范，他们的精神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人。

(2)无限忠诚于祖国，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精神及其影响。提及我国历史上有民族气节的外交家，人们自然会想到苏武，他一向是我国历史上有民族气节的人物的代表，汉代以来，歌颂苏武精神的故事、诗词、歌曲广为流传。苏武于武帝天汉元年（前 100 年）至昭帝始元六年（前 81 年）期间，在匈奴度过一段囚犯生活，但他不为威屈，不为利诱，大义凛然，十九年持汉节不失。

---

① 《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2 页。
② [东晋]法显：《佛国记》，见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2 页。
③ [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校注：《大唐西域记》卷 1《跋禄迦国》，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67 页。
④ 《诗经·小雅·车舝》。(李辰冬：《诗经通释》，台湾水牛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75 页。)
⑤ [明]李贽：《藏书》卷 15《名臣传·疆主名臣》，第 25 页。
⑥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卷 2《与苏武同出使者》，第 52 页。

具有此种精神的汉使不在少数，而对其无限忠诚于祖国，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现在宣传发扬的还远远不够。前文曾述及使者谷吉明知会有生命危险，但仍然坚持出使西域，最终以身殉职。因其功劳并不显著，所以其牺牲为人们所忽视。而笔者认为这种为了祖国利益，自甘牺牲生命的行为，并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这昭示出一个人超乎寻常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盲目以成败来论英雄，致使谷吉被忽视很是遗憾！

出使西域的陈汤、冯奉世、常惠等人，为了朝廷利益，不惜冒“矫制”获罪的危险，抓住时机，打击了西域的反汉势力，有效地巩固了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地位，他们的爱国精神也值得后人敬仰。何谓“矫制”？“勇于任事的臣子，在某些特殊条件下，敢于打破常规，假托接受皇帝制诏，当机立断地处理某些急迫的军政事务，就构成所谓的‘矫制’（亦称‘矫诏’）行为。”[①]“矫制”行为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侵犯和冲击。对矫制行为，汉代以酷烈之刑惩治。汉代矫制之罪分三等，即：矫制大害、矫制害、矫制不害。对“矫制大害”者最重的处罚，可至腰斩酷刑；对“矫制害”者的惩处，虽免于腰斩，但也要被处死；对“矫制不害”者的处置，当为免官。[②]所以说，出使期间，西汉使者矫制行事是要冒相当大风险的，一旦获罪，他们可能会达到矫制之罪的任何一等，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以生命代价来邀功请赏，非常人所为。所以说西汉使者矫制行事并不能简单地说是为求奇功。陈汤、冯奉世、常惠等使者矫制而行，从表面上看是蔑视皇权，但实际上他们是为维护国家利益不得已才冲撞皇权。敢于这样做的使者，固然难免逃脱急欲建立奇功之嫌，但这更应该是他们真正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表现。

这些使者为了国家的利益，甘冒如此大的危险，向皇权的至尊地位挑战，着实值得敬佩。在汉代，他们的功绩就被认为是空前绝后的。“傅（介子）、郑（吉）、甘（延寿）、陈（汤）之功没齿不可复见。”[③]

出使匈奴、西域的过程中，使者所体现出的无限忠诚于祖国，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精神，极其可贵。苏武保持民族气节是一种表现方式；谷吉自甘以身殉职是一种表现方式；陈汤、冯奉世、常惠等人矫制立功，巩固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地位也是一种表现方式，都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二 消极影响

1、遣使频繁给西汉以及西域当道各国带来沉重负担

西汉出于各种目的，向匈奴和西域都曾频繁派遣使者，因此维持多批次的使者、使团远途出使的费用极为庞大，包括:修路造桥，建筑传舍、邮亭、驿置，

---

① 参见孙家洲、李宜春：《西汉矫制考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53页。
② 孙家洲、李宜春：《西汉矫制考论》，第55页。
③《汉书》卷70《段会宗传》，第3029。

设官，养马，雇佣卒役的费用，还有征召使者的开销，馈赠品的花费等。

使者出使的费用：一是靠普遍的徭役制度，如修路、车马船供应，守戍候望，都是百姓无偿服务；一是靠政府拨付。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赋税。由于武帝一改前朝所奉行的“无为”政策，以大有为的姿态来处理各种事务，所以，解决与四境各族的矛盾成为武帝在位二十年里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多事四夷，导致了“天下费多，财用益匮”[①]，也使得百姓头上的徭役越来越重。昭帝曾召开盐铁会议，会议上文学一方说到了当时的徭役情况：

> 今中国为一统，而方内不安，徭役远而外内烦也。古者，无过年之徭，无逾时之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②]

而对边郡人民来说，负担更重，故而“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③]武帝后期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固然主要是由大规模的征匈战争引起的，但为了招抚匈奴和西域，而大批次地遣派使者出使所需的相关费用，也应该是造成当时财政危机的原因之一。

遣使频繁给西域当道诸国也造成沉重负担。楼兰、车师等当道西域小国，明显表现出不堪忍受供应频繁往来的使者所带来的经济负担。正如《剑桥中国秦汉史》所说：“食物供应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困难的问题，定居在孤立的绿洲地区各小国经常抱怨汉朝加在他们头上的因要求它们为使节提供食物和其他服务而造成的沉重的财政负担。”[④]而史书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

> 初，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⑤]
>
> 然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儋粮，送迎汉使，又数为吏卒所寇，惩艾不便与汉通。后复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⑥]
>
> 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匄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⑦]

由于这些当道小国不堪重负，所以它们实施了一些报复性的措施。时而它们自己，时而它们联合匈奴攻杀汉使；时而它们不供应汉使饮食。由于一些当道国家不堪忍受重负而采取的种种报复性的措施，使得好多汉使付出了生命代价。而西汉朝廷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为保障西汉和西域之间交流通畅，也为笼络西域诸

[①]《史记》卷120《汲郑列传》，第3113页。
[②][汉]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卷9《徭役》，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20页。
[③]《汉书》卷96《西域传上》，第3893页。
[④][英]崔瑞德、[英]鲁惟一编，杨品泉、张书生、陈高华、谢亮生、一山、索介然、胡志宏译，张书生、杨品泉校：《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1页。
[⑤]《汉书》卷96《西域传上》，第3876页。
[⑥]《汉书》卷96《西域传上》，第3878页。
[⑦]《汉书》卷96《西域传上》，第3886页。

国，西汉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措施，西域屯田即为其一。

2、个别使者回国后的不实报道给西汉甚至出使国造成的不利影响

西汉时期，中原到匈奴、西域路途遥远，彼此间信息交流不便，故而西汉政府在针对匈奴、西域做出政治、军事决定时，往往参照使者回国后对出使国情况的报道，因此他们的报道是否属实，就显得尤为重要。

前文谈到，武帝曾一度对使匈奴、西域使者人选的考核有所放松，这就导致一些使者素质低下。这些汉使不仅对内“多辱命不称”；[①]而且也不受西域诸国的欢迎。

> 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而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②]

这些汉使对粗鲁对待他们西域国家，极为不满，于是希望西汉出兵教训它们。所以这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汉使回国后，往往不惜歪曲事实，故意把不尊重他们的西域国家说的不堪一击，企图煽动西汉出兵。

> 使者争遍言外国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③]
>
> 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彊弩射之，即尽虏破宛矣。[④]

在这些汉使煽动下，武帝决定用兵西域。

> 於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馀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⑤]

西汉用兵西域主要是基于西汉朝廷或皇帝的整个既定战略，但是，一些轻率的用兵行动与个别汉使不负责地汇报的煽动性信息有一定关系。这里不认为那些主张出兵西域的汉使都不负责，只是指那些歪曲事实，盲目煽动，置双方人民利益于不顾的汉使。如，西汉轻率发动对大宛的战争，给西域人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大宛损失惨重，西域沿途各小国也无端受到骚扰；而对西汉来说，出兵西域，劳师袭远，也损失不小。远征大宛，对稳固西汉在西域的地位固然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西汉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听取了汉使不负责任地汇报的信息，西汉过于轻敌，准备并不充分，最终导致这场战争历时 4 年之久，而且花费极大。“这场持续 4 年之久的战役在王朝的全部历史上是花钱最多的，包括两支远征军”[⑥]。这场战争在为西汉争得一些利益的同时，也给西汉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

---

① 《汉书》卷 79《冯奉世传》，第 3294 页。
② 《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1 页。
③ 《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1 页。
④ 《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4 页。
⑤ 《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1 页。
⑥ [英]崔瑞德、[英]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第 442 页。

第二节　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的特点

一　使者职位的特点

首先，西汉时期的使者，主要受皇帝遣派，也主要受制于皇帝。秦汉的使者“不是代表国家或政府，而是代表皇帝个人。并且使者的职权与出使的方式，全由皇帝诏书决定。”[①]虽由皇帝诏书规定职权与出使方式，但他们并不是失掉所有自主权力，一定程度上仍有代表皇帝的资格，可代表皇帝发言行事。“因为使者的任职主要决定于皇帝，所以使者直接受制于皇帝，不受皇帝以下任何公卿的节制，除非诏书命令他应对某事报告给某官以外，否则他们直接汇报给皇帝。[②]当然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

在皇权削弱、权臣势力膨胀的情况下，使者受权臣派遣，受制于权臣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傅介子前往西域刺杀楼兰王，就是向当时专权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请命，霍光径直布置使命，派遣傅介子出使楼兰，然后霍光才口头禀告汉昭帝。[③]

其次，西汉时期的使者，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受到“人臣无外交”[④]的行为准则的限制，而相对于后世来说，他们更追求表现自我的空间。秦汉以前，出使在外的使者权力较大，有充分表现自我才干的空间，正所谓“大夫受命不受辞。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⑤]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使者纵横于各国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群体。无论是在刀光剑影、殊死拼杀的战场上，还是在彬彬有礼、繁文缛节的邦交礼仪场合下，或是在唇枪舌剑、锱铢必较的谈判中，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时而不畏强暴地据理力争，时而温文尔雅地赋诗言志，时而不辞艰辛地奔走游说，周旋于樽俎之间，折冲于千里之外，使得春秋时期的邦交，色彩斑斓，引人入胜。[⑥]在当时“使者对使命的完成，甚至对两国关系的走向，都有重要的影响力”。[⑦]

秦汉以来，大一统局面形成，以儒家纲常伦理学说为主体的封建礼法制度最终确立，皇权至高无上，使者们很难再得到在历史舞台上充分展示个人魅力的机会，“人臣无外交”成为他们最高行为准则。使者们大都充当的是“高级信差”或皇帝私人代表的角色，任务是遵循固定化的礼仪程式向对方颁发谕旨或转呈文书、物品，没有擅自处理问题、决定事务的权力。较之于春秋战国时期，西汉时期的使者们自由地表现个人的智慧、才能、魅力的空间，就远不如春秋时期的使

[①] 陶希圣、沈巨尘：《秦汉政治制度史》，第 33 页。
[②] 陶希圣、沈巨尘：《秦汉政治制度史》，第 35 页。
[③] 参见《汉书》卷 70《傅介子传》，第 3002 页。
[④]《礼记·交特性》载：“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447 页。）
[⑤]《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王维堤、唐书文撰：《春秋公羊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40 页。
[⑥] 参见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 页。
[⑦] 刘为：《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序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者们那么广阔。西汉时期出使匈奴和西域的使者制造了一系列“矫制”事件，是西汉出使域外的使者权力受限的最好说明。但秦汉毕竟紧紧承继春秋战国时期而来，使者们不可能短期内就变得非常循规蹈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系列出使域外的使者们所制造的“矫制”事件，也表明由于西汉距离春秋战国时期尚不算远，受前代使者们自由精神影响，西汉时期的使者，有强烈展示个人才能和魅力，建功立业的欲望。

二 使者出身的特点

史书中对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自身情况的记载，并不很详细。有很多使者连姓名也没有留下，有的侥幸留下姓名，但具体情况记载得又不很清楚，故而有关他们出身的资料稀缺。就有限史料分析，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的出身情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

1、使者的父辈熟悉西汉外交情况。古代社会，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渠道不太畅通，各种知识、信息传播范围有限，而外交方面的知识是关于外族和外国的，了解者甚少，所以传播的范围就更加有限，因此出身于熟悉外交情况的家庭，有助于一个人他日成为外交工作人员。

据考察，一些使匈奴、西域使者出身于对西汉外交情况较为了解的家庭。比较典型的就是元帝时期出使匈奴的张猛、萧育、萧咸、萧由。其中，张猛是外交家张骞的孙子。有关张骞的情况，人所尽知，不赘言。萧育、萧咸、萧由均为西汉官员萧望之的儿子。萧望之曾经担任大鸿胪，主管外交工作，外事经验丰富，外交技巧娴熟。史书有载的西汉解决重大外交问题的场合，常有萧望之的出现。如，五凤元年（前 57 年）匈奴大乱，宣帝召开中朝决策会议商讨对策。当时大多数官员主张趁机出兵消灭匈奴，但宣帝犹豫不决，于是他派若干中朝官员前去请教御史大夫萧望之。[①]萧望之表明自己反对乘乱攻伐匈奴之后，进一步提出具体建议：“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宣帝采纳他的建议，“后竟遣兵护辅呼韩邪单于定其国”[②]。可见，萧望之熟悉西汉外交事务。皇帝也很尊重他的建议。张骞和萧望之均为西汉著名的外交专家，所以他们的后代耳濡目染，对外交事务产生兴趣，也较为熟悉一些外交经验技巧，当是自然之事。所以张骞、萧望的后代也走上出使域外的道路，从事了外交工作，继承前辈，继续为西汉的外交事业奋斗。萧望之的三个儿子都做了出使匈奴的使者，很好地说明了出身于父辈熟悉西汉外交情况的家庭环境，对于成为外交使者有重大影响。

2、使者的父辈深受皇帝重视。西汉时期，朱建和枚乘都是汉皇帝比较仰慕但却没有得到的人才。朱建是文帝比较欣赏的人才。

[①]《汉书》卷 78《萧望之传》，第 3279 页。
[②]《汉书》卷 78《萧望之传》，第 3280 页。

孝文时，淮南厉王杀辟阳侯，以党诸吕故。孝文闻其客朱建为其策，使吏捕欲治。闻吏至门，建欲自杀。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杀为？"建曰："我死祸绝，不及乃身矣。"遂自刭。文帝闻而惜之，曰："吾无杀建意也。"乃召其子，拜为中大夫。使匈奴，单于无礼，骂单于，遂死匈奴中"。[①]

枚乘在景帝时就很出名，"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②]。后来武帝也很仰慕枚乘。"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后乃得其孽子皋。"[③]"皋字少孺。……皋亡至长安。会赦，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使匈奴"。[④]

朱建自杀，文帝"闻而惜之"；枚乘年老，武帝征召他之心仍在。足见朱建、枚乘均为汉皇帝比较仰慕，但却没有得到的人才。朱建、枚乘，求而未得，文帝、武帝渴求贤才之心愈烈，转而把期望寄托到朱建和枚乘的儿子身上。于是朱建之子和枚皋被征召为皇帝身边的近臣，因皇帝多派遣身边近臣为使者出使，所以他们最终被委以重任出使匈奴，因此笔者认为枚乘和朱建之子能够成为出使域外的使者跟汉皇帝曾敬慕其父有一定的关系。

3、家境贫穷。西汉时期出使匈奴和西域的使者，也有不少出身于贫穷家庭。如：

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⑤]

常惠，太原人也。少时家贫，自奋应募，随栘中监苏武使匈奴。[⑥]

（公孙弘）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⑦]

陈汤"少好书，博达善属文。家贫匄貣无节，不为州里所称"。[⑧]

以使西域闻名的傅介子、郑吉，均为卒伍出身。傅介子"以从军为官"[⑨]。郑吉"以卒伍从军，数出西域，由是为郎"[⑩]。少年从军者一般也出身贫寒。

这些出身于贫穷家庭的子弟，之所以成为出使匈奴、西域的使者，是因为：其一，出身贫寒者一般身体经受过锻炼，比较强壮；其二，出身贫寒者，一般意志较坚强，生存能力也较强。要经受遥远而艰辛的长途跋涉，这些素质是不可缺少的。

---

① 《汉书》卷 43《朱建传》，第 2118 页。
② 《汉书》卷 51《枚乘传》，第 2365 页。
③ 《汉书》卷 51《枚乘传》，第 2365 页。
④ 《汉书》卷 51《枚皋传》，第 2366 页。
⑤ 《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1 页。
⑥ 《汉书》卷 70《常惠传》，第 3003 页。
⑦ 《汉书》卷 58《公孙弘传》，第 2613 页。
⑧ 《汉书》卷 70《陈汤传》，第 3007 页。
⑨ 《汉书》卷 70《傅介子传》，第 3001 页。
⑩ 《汉书》卷 70《郑吉传》，第 3005 页。

三 使者出使成功与否的辩证

1、从群体角度来看，一定程度上来说，西汉出使匈奴、西域的使者是成功的。

首先，西汉使者频繁出使，群体共同努力，有力地配合了西汉对匈奴、西域实施的各项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协助中央政权逐步实现了对匈奴和西域的统辖，建立起双方的藩属关系；之后，进一步在维系双方的藩属关系过程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其次，西汉主管匈奴、西域事务的最高军政长官的设置和出使当地的汉使关系密切。西汉在西域设置的最高军政长官是“西域都护”，东汉专门设立的负责南匈奴辖境事务的最高长官是“使匈奴中郎将”，它们均由对出使当地使者临时性质的“加官”逐步演变为正式职官，这两个官职都和出使当地的使者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西汉第一任西域都护郑吉，早先是一位出使西域的使者。之后的“西域都护”，也有做过出使西域使者的，如段会宗。“使匈奴中郎将”的设立，与出使匈奴的使者也有很大的关系。由于汉匈经常处于交战状态，所以西汉使者出使匈奴时，常派武职官员中郎将充任，以后成为惯例，便出现了“使匈奴中郎将”这一官名。《汉书·金日磾传》记载：“而（金）参使匈奴，匈奴中郎将。”颜师古注曰：“以其出使匈奴，故拜为匈奴中郎将也。”[①]这种临时差遣的使者，到东汉初年转变为常驻使者。建武二十六年（50 年）“诏遣中郎将段彬、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护卫之”[②]，正式设立“使匈奴中郎将”一职，此后成为常置官职。

正因为西汉使者在西汉与匈奴、西域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西汉在临时性派遣使者的基础上，设立了来源与出使使者关系密切的官职来管理匈奴和西域。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西汉时期出使匈奴和西域的使者，从群体角度来看，比较成功。

群体意义上的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能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下一些因素：

首先，西汉为特定目的频繁地向匈奴和西域派遣使者，他们常常能凭数量上的优势来达到圆满完成任务的目的。“使者十辈来”，[③]“前后十余辈”，[④]“使者相望于道”[⑤]，史书中诸如此类记载使者频繁出使匈奴、西域盛况的句子很多。而具体来说，高帝出兵匈奴前，派使者前往匈奴窥探匈奴虚实情况，武帝时汉匈军事对抗，向匈奴派遣使者探查匈奴实际情况，武帝求西域宝马时，西汉都是一

[①]《汉书》卷 68《金日磾传》，第 2964 页。
[②]《资治通鉴》卷 44《汉纪》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第 297 页。
[③]《汉书》卷 43《娄敬传》，第 2121 页。
[④]《汉书》卷 94《匈奴传上》，第 3774 页。
[⑤]《汉书》卷 61《张骞传》，第 2694 页。

批接一批地派出使者。甚至为诸如调查一个下落不明的使者之类的事情，西汉也要向目的地派出好几批使者。如为探知出使的使者谷吉、苏武等人的情况，西汉曾再三遣派使者前往匈奴。总之，出使使者的数量优势是他们群体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其次，得益于西汉强大的经济实力。西汉经济实力雄厚，这是西汉能够向匈奴和西域频繁派遣使者及使团的经济保障；而且西汉曾一度仰仗经济实力雄厚，对匈奴和西域实行厚赂政策，所以使者出使时，大多带有很多财物作为馈赠的礼品。这种厚赂政策是使者们宣扬西汉国威，顺利完成出使任务的重要保障。

再次，得益于西汉强大的军事实力。客观地说西汉使者能取得群体成功与西汉军事实力强大有很大关系。正因为西汉与匈奴和西域的一些国家之间的战争，显示了西汉强大的军事实力，才使得西汉的声威大振，西汉使者到匈奴和西域的道路交通安全及食宿条件才得以保障；而且，一些国家向汉使敞开国门，愿意通过汉使和西汉建立亲密的关系，西汉使者能受到尊重，地位提升，也和西汉军事实力的增强有很大的关系。如匈奴一直是西汉最为头疼的边患，西汉中后期，西汉使者敢于前往匈奴进行诱劝，企图使匈奴投降西汉，这些和西汉对匈奴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击战争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西汉的军事实力，是西汉使者在群体上能够取得成功的又一重要保障。

2、从个体角度来看，一定程度上说，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的表现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西汉出使匈奴、西域的使者并不是都做到了出使不辱使命。他们中固然多表现优秀者，但仍有许多表现不如人意者：如部分汉使对西汉与匈奴、西域关系的发展起了反作用，部分汉使并没有完成他们出使的使命，部分汉使变节投降出使国……西汉使者，不论是出使匈奴的，还是西域的，都没有出现象春秋战国那样外交群星争奇斗艳的盛况。出使西域的使者，有几个立功绝域、名流后世的，但基本是以勇武见长；而众多出使匈奴的使者中，后世留名的竟很少。尤其不足的是，西汉使者展示出的个人才智明显地大为逊色于春秋战国的使者。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西汉派往匈奴和西域的使者的个体表现不尽如人意。

具体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鉴于当时出使域外比较艰辛，非人所乐往，西汉曾一度对选拔使者工作有所松懈，致使使者群中鱼龙混杂，所以，一些使者表现不如人意也在所难免。

其二，秦汉以来，大一统的局面形成，“人臣无外交”成为使者们的最高行为准则，使者们很难再得到在历史舞台上展示个人魅力的机会。

结 语

西汉是中国古代外交的重要发展时期。其时，在周边出现了与中原皇朝并峙的少数民族政权，第一次开启了中原皇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官方“外交”关系；张骞“凿空”西域，中国第一次打开大门与外部世界开始了外交联系，从此才有了真正国际意义上的外交。西汉与匈奴、西域的交往，即是在这两个层面上进行的。在汉匈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交往过程中，使者往来频繁密切；而西汉在统一、统治西域过程中，来往使者也是相望于途。

出于交往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等客观条件相对成熟的条件下，西汉向匈奴、西域派遣了数量极为可观的使者。而这些受朝廷派遣的使者，则是怀着建功立业、追名逐利、传播华夏文明等各种各样的目的，踏上出使异域的艰难行程的。

按出使任务来分，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可分为和亲使者、探查使者、贸易使者、劝诱使者等类型。无论何种类型的使者，他们多是代表皇帝而衔命出使，要求素质要比较高，因此西汉统治者通过招募、征召、举荐等多种方式来选拔使者。考察发现，西汉时期选拔使者时，统治者注重对强壮、勇武等素质的要求，当时使者也多出身武职人员，使者的人选较之于先秦时期有所变化。先秦时期，使者以辩士为主，勇士（壮士）次之；而西汉则以勇士（壮士）为主，辩士次之。

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从事了大量促进西汉与匈奴、西域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交流的活动。统而言之，他们对西汉与匈奴、西域之间纵深交流，以及双方政治关系的基本走向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西汉使匈奴、西域使者队伍中素质不高者大有人在，因而从个体角度看，他们不可避免地产生过一些消极影响，但总体而言，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和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虽然单个使者的能力有限，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为西汉与匈奴、西域之间的交流以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

文中笔者对一些问题略有浅见，虽经反复斟酌，终还只是差强人意。浅显鄙陋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本文在资料收集方面失之于详尽，在理论分析方面失之于浅显，尚需假以时日，进一步努力，加以完善！

附表 1：

西汉使匈奴使者情况简表

出使时间		使者		主要出使事迹	资料出处
汉代纪年	公元纪年	姓名	身份		
高帝七年	前 200 年	缺名		高帝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	《汉书·娄敬传》
同上	同上	刘敬		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易击。高帝使刘敬复往使匈奴勘查匈奴的情况。	同上
同上	同上	缺名		高帝使使者到匈奴厚赂匈奴单于阏氏。	同上
同上	同上	缺名		刘邦利用胡骑稍稍引去。天雾，汉使人往来，胡不觉的时机，逃出了匈奴重围。	同上
同上	同上	刘敬		汉亦引兵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	同上
高帝九年冬	前 198 年	刘敬	建信侯	高帝使刘敬奉宗室女名为公主，嫁与单于为阏氏；约为兄弟以和亲。	《史记·匈奴列传》
惠帝三年	前 192 年	张释	中大谒者	冒顿使使遗吕后书，污辱吕后。吕后暂忍，令大谒者张释报书，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	同上
文帝元年	前 179 年	缺名		汉与匈奴复修和亲之事。	同上
文帝四年	前 176 年	缺名		匈奴向汉求和亲，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认为，和亲为好，于是汉许之。	同上
文帝六年	前 174 年	意	中大夫	文帝复单于书，复故约，赐匈奴衣物，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致赐匈奴单于。	同上
同上	同上	肩	谒者令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中行说	宦者	文帝复遣宗室女为匈奴单于阏氏，使中行说伴送公主。	同上
同上	同上	朱建之子	中大夫	文帝以平原君朱建之子出使匈奴，因骂单于死于匈奴。	《汉书·朱健传》
文帝十一年	前 169 年	宋忠	中大夫	汉中大夫宋忠使匈奴，不至而还，抵罪。	《史记·日者列传》
文帝十四年	前 166 年	缺名		匈奴日已骄，侵扰汉边。汉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	《史记·匈奴列传》
文帝后二年	前 162 年	缺名		文帝再遣使遗单于书，与约和亲。诏遗单于秫蘖、金帛、丝絮、它物岁有数。	《汉书·匈奴传上》
文帝后三年	前 161 年	缺名		老上单于死，军臣单于立。文帝复与匈奴和亲。	同上
景帝元年夏四月	前 156 年	翟青	御史大夫	汉遣御史大夫翟青（陶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	《汉书·景帝纪》
景帝二年秋	前 155 年	缺名		汉与匈奴和亲。	《汉书·景帝纪》
景帝五年夏	前 152 年	缺名		汉遣公主嫁匈奴单于，通关市，给遗匈奴，如故约。	《汉书·匈奴传上》
建元元年	前 140 年	缺名		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	《汉书·匈奴传上》

建元元年	前 140 年	公孙弘	博士	武帝遣博士公孙弘使匈奴。还报，不合帝意 。	《汉书•公孙弘传》
元光六年	前 129 年	枚皋	郎官	武帝拜枚乘子皋为郎，使匈奴。	《汉书•枚皋传》
元狩四年	前 119 年	任敞	丞相长史	丞相长史任敞认为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汉使任敞于单于。单于闻敞计，大怒，留之不遣。	《史记•匈奴列传》
元鼎年间	前 116—前 111 年	终军	谒者	谒者终军自请出使，愿画吉凶于匈奴单于前。	《汉书•终军传》
元封元年	前 110 年	郭吉		汉武帝巡边，遣使者郭吉讽告匈奴单于，言辞激烈，单于留郭吉不归，迁之北海上。	《汉书•匈奴传上》
元封四年	前 107 年	王乌		汉使王乌窥匈奴。	同上
同上	同上	杨信		汉认为匈奴弱，可以臣服，遂遣杨信往说之。	同上
同上	同上	王乌		汉复遣王乌使匈奴。	同上
元封六年	前 105 年	路充国	二千石官	汉遣路充国送匈奴贵人使者丧，留之不归，太初四年归。	同上
同上	同上	缺名		儿单于立，汉遣一使者吊单于，留不遣。	同上
同上	同上	缺名		儿单于立，汉遣一使者吊右贤王，留不遣。	同上
具体出使时间不详	具体出使时间不详	卫律		李延年荐卫律使匈奴。使还，会延年家收，律惧并诛，亡还降匈奴。	《汉书•李陵传》
天汉元年	前 100 年	苏武	中郎将	且鞮侯单于既立，尽归汉使之不降者。于是，汉遣中郎将苏武厚币赂遗单于，留之不归，始元六年始放还。	《汉书•匈奴传上》
同上	前 100 年	张胜	中郎将	张胜为苏武使团副使。	同上
同上	前 100 年	常惠	假吏	常惠也为苏武使团副使，始元六年还。	同上
同上	前 100 年	徐圣		随苏武出使匈奴，始元六年还。	同上
同上	前 100 年	赵忠根		随苏武出使匈奴，始元六年还。	同上
征和二年	前 91 年	江充	谒者	江充自请出使，上以充为谒者使匈奴。	《汉书•江充传》
征和四年	前 89 年	缺名		匈奴单于遣使遗汉书。汉遣使者报送其使，单于扣留汉使者三岁，乃放还。	《汉书•匈奴传上》
始元二年	前 85 年	缺名		壶衍鞮单于既立，风谓汉使者，言欲和亲。	同上
始元六年	前 81 年	缺名		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	《汉书•苏武传》
同上	同上	缺名		后汉使复至匈奴，再次招武，见到同苏武同入匈奴的常惠，终于了解到苏武确实还活在匈奴的消息。	同上
同上	同上	任立政	李陵故人	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	《汉书•李陵传》
元凤二年	前 79 年	缺名		匈奴欲和亲，常使左右讽汉使者。侵犯益希，遇汉使愈厚，欲以渐致和亲。	《汉书•匈奴传上》

本始元年	前 73 年	路温舒	右扶风丞	内史举温舒文学高第，迁右扶风丞。时，诏书令公卿选可使匈奴者，路温舒上书愿往。	《汉书·路温书传》
本始二年	前 72 年	冉弘		祁连将军出塞千六百里……逢汉使匈奴还者冉弘等，言鸡秩山西有虏众，祁连即戒弘，使言无虏，欲还兵。	《汉书·匈奴传上》
神爵二年	前 60 年	缺名		汉使使者到匈奴致金帛赎苏武胡妇子通国，通国随汉使归汉。	《汉书·苏武传》
五凤元年	前 57 年	缺名		匈奴内乱，宣帝从萧望之之意，遣使吊问，希望通过辅其微弱，救其灾患，使匈奴幕义称臣。	《汉书·萧望之传》
甘露二年	前 52 年	韩昌	车骑都尉	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诏车骑都尉韩昌迎之。	《汉书·匈奴传下》
甘露三年	前 51 年	董忠	高昌候	呼韩邪单于朝汉北归，汉遣高昌候董忠等将兵送出朔方鸡鹿塞，留卫单于，助诛不服。	同上
初元五年	前 44 年	江乃始		郅支单于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汉使者江乃始等。	《汉书·陈汤传》
同上	同上	谷吉	卫司马	汉遣卫司马谷吉送郅支单于侍子，既至，郅支杀谷吉。	同上
永光元年	前 43 年	张猛	光禄大夫	汉遣元帝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还呼韩邪侍子，并探问谷吉等音讯，与呼韩邪单于盟。	《汉书·匈奴传下》
同上	同上	韩昌	车骑都尉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缺名		汉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尸。	《汉书·陈汤传》
竟宁元年	前 33 年	缺名		呼韩邪单于自言愿做汉的女婿，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汉书·匈奴传下》
同上	同上	许嘉	车骑将军	匈奴呼韩邪单于与汉和亲之后，提出让汉朝撤销北部边防的请求，汉元帝在听取郎中侯应的意见之后，决定不解除边塞之武备，并派车骑将军许嘉前往匈奴向单于进行解释。	同上
汉元帝时	具体出使时间不详	萧育	谒者、使匈奴副校尉	时令校尉为使于匈奴而育为之副使，故授副校尉也。	《汉书·萧育传》
汉元帝时	同上	萧育	中郎将	后坐失大将军指免官。复为中郎将使匈奴。	同上
汉元帝时	同上	萧咸	中郎将	萧望之之孙以中郎将使匈奴。	《汉书·萧咸传》
汉元帝时	同上	萧由	副校尉	萧望之之孙，以副校尉使匈奴。	《汉书·萧由传》
建始元年	前 32 年	姚尹	右将军长史	右将军长史姚尹使匈奴还。	《汉书·成帝纪》
和平二年	前 27 年	缺名		河平元年，单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献朝正月。既罢，遣使者送至蒲反。	《汉书·匈奴传下》

同上	同上	王舜	中郎将	送伊邪莫演的汉使回来报告伊邪莫演有欲降之心，汉遣中郎将王舜前往问他为什么要降汉。	同上
和平三年	前 26 年	班伯		单于上书，愿朝汉，汉使班伯持节迎于塞下。	《汉书•叙传上 》
和平三年	前 26 年	王舜	侍中、中郎将	汉使班伯持节迎匈奴单于途中遇到定襄大姓作乱，上于是遣侍中中郎将王舜驰传代伯护单于，拜伯为定襄太守。	同上
鸿嘉元年	前 20 年	杨兴	中郎将	鸿嘉元年正月，匈奴单于雕陶莫皋死。五月甲午，遣中郎将杨兴使吊。	《汉书•天文志》
绥和元年	前 8 年	夏侯藩	中郎将	夏侯藩以中郎将使匈奴。	《汉书•匈奴传下》
同上	同上	韩容	副校尉	韩容以副校尉使匈奴。	同上
同上	同上	夏侯藩	中郎将	藩、容归汉。后复使匈奴，至则求地。	同上
同上	同上	韩容	副校尉	同上	同上
哀帝时期	具体出使时间不详	金参	使匈奴中郎将	金伦玄孙，出使匈奴，为使匈奴中郎将。	《汉书•金日磾传》
建平二年	前 5 年	丁野林	中郎将	为汉使责让单于，令归还乌孙质子 。	《汉书•匈奴传下》
同上	同上	公乘音	副校尉	同上	同上
元寿二年	前 1 年	韩况	中郎将	单于北归。汉遣中郎将韩况送单于出塞。	同上
元始二年	公元 2 年	韩隆	中郎将	车师二王降匈奴，单于受之。汉遣使者责让单于。	同上
同上	同上	王昌	中郎将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帛敞	侍中谒者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甄阜	副校尉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王歙	长水校尉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王萌	中郎将	单于叩头谢罪，执二虏还付使者。诏使中郎将王萌待西域恶都奴界上逆受。	同上
同上	同上	王骏	中郎将	王莽遣中郎将王骏、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寻使匈奴，班四条与单于。	同上
同上	同上	王昌	中郎将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甄阜	副校尉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王寻	副校尉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缺名		王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遣使者讽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	同上

注：此表年代推算主要参考《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匈奴历史年表》[1]。

[1] 林幹：《匈奴历史年表》，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附表 2：

西汉使西域使者情况简表

出使时间		使者		主要出使事迹	资料出处
汉代纪年	公元纪年	姓名	身份		
建元三年	前 138 年	张骞	郎官	寻找西迁的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	《汉书·张骞传》
元狩四年	前 119 年	张骞	中郎将	寻找西迁的乌孙，联合抗击匈奴。	《史记·大宛列传》
同上	同上	缺名		张骞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	《汉书·张骞传》
元狩五年	前 118 年	缺名		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在东界欢迎。	《史记·大宛列传》
元鼎二年左右	前 115 年左右	缺名		武帝喜好宛马，使者相望於道求之。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	同上
元鼎五年	前 112 年	缺名		汉使西逾葱岭，抵安息。安息发使，随汉使献见武帝。	同上
元封六年	前 105 年	缺名		汉以江都王刘建女细君为公主，嫁往乌孙。	《汉书·西域传下》
元封六年—太初二年之间	前 105 年—前 103 年之间	缺名		细君公主作《黄鹄歌》，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她。	同上
太初元年	前 104 年	王恢	中郎将	楼兰、姑师小国，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	《史记·大宛列传》
同上	同上	姚定汉	黄门	前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	同上
同上	同上	车令	期门郎	武帝遣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善马，大宛不肯，遂相交恶。	同上
同上	同上	朝	中郎将	危须以西及大宛皆合约杀期门车令、中郎将朝及身毒国使，隔东西道。	《汉书·李广利传》
太初二年	前 103	缺名		细君公主死，汉复以楚王刘戊孙女解忧公主，嫁乌孙昆弥（王）军须靡。	《汉书·匈奴传下》
太始三年	前 94 年	续相如	承父侯	使西域发外王子弟，诛斩扶乐王首，虏二千五百人。	《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武帝时期	具体出使时间不详	王忠	副光禄大夫	前副光禄大夫王忠使西国，为匈奴所遮，忠战死。	《汉书·匈奴传上》
同上	同上	马宏		与王忠同使西国，为匈奴所遮，马宏生得，不肯降。	同上
昭帝时期	具体出使时间不详	安乐	卫司马	楼兰王安归常发兵杀略卫司马安乐。	《汉书·傅介子传》
同上	同上	忠	光禄大夫	楼兰王安归常发兵杀略光禄大夫忠。	同上
同上	同上	遂成	期门郎	楼兰王安归常发兵杀略期门郎遂成。	同上
元凤四年	前 77 年	傅介子	平乐监	使大宛，至楼兰、龟兹，责其王。从大宛还，到龟兹，诛斩在龟兹的匈奴使者。同年复使楼兰，杀楼兰王安归，立尉屠耆为王。	同上

本始二年	前 72 年	常惠	光禄大夫	因乌孙求救，汉遣常惠使匈奴	《汉书·常惠传》
同上	同上	常惠	校尉	常惠为校尉，持节护乌孙兵，共击匈奴。	同上
本始三年	前 71 年	常惠	长罗侯	遣常惠持金币赐乌孙人有功者，从乌孙还，发西域诸国兵攻龟兹。	同上
地节二年	前 68 年	郑吉	侍郎	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屯田渠犁，欲垦田积谷，以攻车师。	《汉书·西域传下》
同上	同上	司马憙	校尉	同上。	同上
地节四年	前 66 年	乐奉	侍郎	汉遣侍郎乐奉送解忧公主女，过龟兹。	同上
同上	同上	奚充国		汉遣使者奚充国送解忧公主少子万年到莎车做了莎车王。	《汉书·西域传上》
元康元年	前 65 年	冯奉世	卫候	汉遣冯奉世送大宛诸国客。冯奉世以节谕告西域诸国发兵击莎车，攻拔其城。	《汉书·冯奉世传》
同上	同上	严昌		冯奉世使团副使。	同上
元康二年	前 64 年	常惠	常罗侯	宣帝遣常惠将张掖、酒泉骑兵迎车师驻屯吏士还渠犁；又召逃亡焉耆的前车师太子军宿，立为车师王。	《汉书·西域传下》
元康四年	前 62 年	殷广德	侍郎	汉使侍郎殷广德责乌孙，求车师王乌贵。	同上
神爵二年	前 60 年	常惠	常罗侯	常惠送相夫公主和亲乌孙，未出塞，闻乌孙昆弥翁归靡死。常惠驰至乌孙，责让乌孙不立汉外孙元贵靡为昆弥。	同上
甘露元年	前 53 年	魏和意	卫司马	汉使卫司马魏和意，副侯任昌至乌孙，解忧公主与汉使设谋刺杀暴虐的狂王。	同上
同上	同上	任昌	副侯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张遵	中郎将	为缓和因刺杀狂王事件而恶化的西汉与乌孙关系的，汉遣中郎将张遵持医药治狂王，赐金帛；因收和意，昌系琐，从尉犁槛车至长安。	同上
同上	同上	张翁	车骑将军长史	张翁留验公主与使者谋杀狂王事件。	同上
同上	同上	季都		副使季都别将医养视狂王。	
同上	同上	冯嫽		宣帝遣冯嫽出使乌孙，持节诏乌就屠至赤谷城诣常罗侯常惠，立元归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汉印绶。	同上
同上	同上	竺次	谒者	送冯嫽出使乌孙。	同上
同上	同上	甘延寿	期门郎	送冯嫽出使乌孙。	同上
同上	同上	常惠	常罗侯	汉复遣常惠至乌孙，将三校尉屯赤谷，分划大、小昆弥地界、人民。	同上
甘露三年	前 51 年	冯嫽		冯嫽上书求使，汉遣她使乌孙，镇抚乌孙大昆弥星靡。	同上

建昭三年	前 36 年	甘延寿	郎中谏大夫、使西域都护骑都尉	汉遣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出使西域。甘延寿、陈汤矫制发西域诸国兵攻破郅支城，诛斩郅支单于。	《汉书·西域传上》。备注：师古曰："延寿及汤本充西域之使"
同上	同上	陈汤	副校尉	同上	《汉书·西域传上》。
元帝时期（前 48—前 33 年）	具体出使时间不详	文忠	关都尉	罽宾王遣使入汉奉献。汉以文忠为使送罽宾使者归国。罽宾王欲害文忠，文忠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印绶。	同上
同上	同上	赵德	军候	后来汉又遣军候赵德使罽宾。赵德与阴末赴失和，阴末赴锁禁赵德，并杀汉副使以下 70 余人，汉与罽宾绝而不通。	同上
建始三年	前 30 年	段会宗		乌孙小昆弥拊离为其弟日贰所杀。汉遣段会宗为使者至乌孙，立拊离子为小昆弥，日贰奔康居。	《汉书·西域传下》
和平四年	前 25 年	缺名		成帝即位，罽宾复遣使献并谢罪，汉遣使报送其使。	《汉书·西域传上》。
阳朔四年	前 21 年	缺名	卫司马	康居太子保苏匿率万人欲降汉，汉遣卫司马逢迎。	《汉书·段会宗传》。
鸿嘉四年	前 17 年	段会宗	左曹中郎将光禄大夫	约是年，乌孙国乱。汉遣段会宗为使，立安日弟末振将小昆弥，定其国而还。	同上
永始元年	前 16 年	段会宗	中郎将	汉复遣段会宗至乌孙，立解忧公主孙伊秩靡为乌孙大昆弥。	《汉书·西域传下》
元延二年	前 11 年	段会宗	中郎将	汉复遣段会宗发戊己校尉及诸国兵，诛杀末振将。	《汉书·段会宗传》。
元延四年	前 9 年	段会宗		约是年，乌孙前小昆弥末振将弟卑爰疐欲借兵兼并乌孙大小昆弥。汉遣段会宗使乌孙，与西域都护并立以备之。	《汉书·段会宗传》。

注：此表年代推算主要参考《史记》、《汉书》、《资治通鉴》。

参考文献

一、古籍类：

1.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2.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3. 【汉】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
4. 【汉】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中华书局，1980年
5.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
6. 【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
7. 【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8. 【明】李贽：《藏书》，中华书局，1959年。
9. 【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
10.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
11.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1984年。

二、专著类：

1.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 林剑鸣：《秦汉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3.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4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4. 黄宝石：《中国历代行人考》，台北:中华书局,1980年。
5.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
6.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7. 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8.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9. 芦苇：《中外关系史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 何芳川、万明：《古代中西交流史话》，商务印书馆，1998年。
11. 石云涛：《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学苑出版社，2003年。
12. 李樵：《中国历代外交家列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13.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
14. 热扎克·买提尼亚孜(维吾尔族)主编：《西域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
15. 李明伟主编：《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
16. 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17. 马达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18. 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
19. 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
20. 林幹编：《匈奴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84年。
21. 黄时鉴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22. 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
23. 马大正：《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24. 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25. 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99年。
26. 张维华：《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

27. 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28. 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
29. 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30. 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
31.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
32. 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 2004年。
33.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34. 马大正等：《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35. 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
36. 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
37. 林幹：《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书局，1983年。
38. 杨建新、卢苇：《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
39. 武伯纶：《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40. 沈巨尘、陶希圣：《秦汉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1936年。
41.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内蒙古大学蒙古研究室编：《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
42. 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43. 【法】莫尼尔·玛雅尔著、耿昇译：《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中华书局，1995年。
44. 【日】羽田明著、娄贵书译：《西域史》，载《中亚史丛刊》第5期。
45. 【英】崔瑞德、【英】鲁惟一编，杨品泉、张书生、陈高华、谢亮生、一山、索介然、胡志宏议，张书生、杨品泉校：《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三 、论文类:

1. 刘戈：《试论张骞通西域》，《新疆史学》，1979年创刊号。
2. 陈浮：《汉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理论研究》，1981年第3期。
3. 胡刚：《论西汉对匈奴政策的变迁和得失——兼评汉武帝的历史作用》，《求索》，1982年第4期。
4. 傅永聚：《张汤新议》，《江淮论坛》，1982年第5期。
5. 刘光华：《段会宗在西域活动的年代背景及其评价》，《兰州大学学报》，1983 年中国古代史论文辑刊。
6. 张长明：《试论西汉的汉匈关系及和亲政策》，《江淮论坛》，1983年第6期。
7. 王学松：《论汉武帝时期的民族关系》，《北方论丛》，1985年第1期。
8. 彭年：《从“白登之围”到“马邑之谋”——论高惠文景四朝与匈奴的关系》，《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9. 罗大云：《西汉初期对匈奴和亲的实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10. 翟宛华：《论西汉与乌孙的和亲》，《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
11. 史培军：《汉代第一任西域都护——郑吉》，《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12. 高景新：《论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
13. 马国荣：《汉朝中央政府对新疆的行政管理》，《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14. 刘光华：《张骞与西汉中期的“断匈奴右臂”战略》，《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15. 张烈：《从白登之围到昭君出塞——论此阶段的汉匈关系及汉王朝的决策》，《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3期。
16. 龙玉梅：《乌孙与西汉关系述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17. 王家广：《张骞出使西域及其启示》，《人文杂志》，1988 年第 6 期。
18. 李大龙：《西汉郎官及其在治理西域中的作用》，《新疆社会科学》，1989 年第 6 期。
19. 王东春：《对“苏武精神”的现代解释》，《河北师院学报》，1990 年第 4 期。
20. 李大龙：《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者述论》，《民族研究》，1990 年第 6 期。
21. 刘逖：《论汉帝国北部边疆系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论文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22. 天德民：《“丝绸之路”与汉唐“和亲”》，《文博》，1991 年第 1 期。
23. 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贵州民族研究》，1992 年第 2 期。
24. 齐陈骏：《对古丝路上贸易的估价》，《兰州商学院学报》，1992 年第 3 期。
25. 张志坤：《也谈匈奴及其先民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兼同陶克涛同志商榷》，《内蒙古大学学报 1992 年第 3 期。
26. 张涛：《经学与西汉王朝的民族政策》，《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 年第 6 期。
27. 王宗维：《汉代属国制度探源》，《马长寿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28. 李大龙：《西域都护的设立不是乌孙和西汉关系转变的标志》，《西域研究》，1993 年第 1 期。
29. 余太山：《张骞西使新考》，《西域研究》，1993 年第 2 期。
30. 莫任南：《论傅介子出使西域的历史功绩》，《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 年第 5 期。
31. 宋新潮：《匈奴文化及其对两汉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 年第 1 期。
32. 余太山：《西汉与西域关系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4 年第 1、2 期。
33. 龚荫：《关于西汉对匈奴政策之研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 年第 5 期。
34. 谢孝苹：《〈史记·匈奴列传〉札记》，《中亚学刊》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 3 月。
35. 吴郁芳：《昭君家族与汉胡外交》，《江汉论坛》，1995 年第 1 期。
36. 韩香：《试论“使匈奴中郎将”的来源及演变》，《新疆大学学报》，1995 年第 1 期。
37. 姬歆民：《中国最早开放政策的使者——张骞》，《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995 年第 2 期。
38. 戴天：《张骞——我国第一位伟大的外交家》，《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5 年第 2 期。
39. 吴明月：《谈西汉时期汉人入居匈奴及其影响》，《内蒙古师大学报》，1995 年第 4 期。
40. 李卫星：《论两汉与西域关系在汉画中的反映》，《考古与文物》，1995 年第 5 期。
41. 刘江波：《西汉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与首任西域都护——郑吉》，《新疆地方志》1996 年第 2 期。
42. 向红：《〈史记〉中的张骞——读〈史记·大宛列传〉》，《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 3 期。
43. 武金峰：《试论西汉王朝与乌孙的和亲政策》，《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6 年第 4 期。
44. 葛志毅：《汉代的博士奉使制度》，《历史教学》，1996 年第 10 期。
45. 刘彦威：《西汉王朝的边疆经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 年第 3 期。
46. 张菁：《再论汉初的“和亲”》，《南京师大学报》，1997 年第 4 期。
47. 赵志坚：《西汉与匈奴前后期和亲之比较》，《烟台大学学报》，1997 年第 1 期。
48. 白音查干：《论汉武帝对匈奴的征服战争》，《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 年第 5 期。
49. 久玉林《西汉时期汉匈民族的人群流动与文化的双向融合》，《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 6 期。
50. 叶永新：《汉与匈奴第一次、第二次和亲考略——兼与葛亮先生商榷》，《中国边疆史地

研究》1998年第4期。
51. 阿其图：《“马邑之谋”与汉武帝开置郡国的西扩》，《内蒙古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
52. 贺吉范、柴长海：《为开发西域做出贡献的三女性》，《丝绸之路》，1998年第6期。
53. 白庆红：《张骞出使西域及“凿空”的内涵与意义》，《滨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
54. 赵建强、武占江：《西汉盛世的思想文化原因》，《华夏文化》，1999年第2期。
55. 刘厚琴：《儒学与汉武帝的民族政策》，《青海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56. 黎虎：《从汉唐外交决策看外交决策的特殊性》，《大连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57. 黎虎：《汉唐时期外交行政管理的运行机制》，《中州学刊》1999年第3期。
58. 陈梧桐：《西汉王朝开拓边疆斗争的历史意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3期。
59. 彭建英：《论汉匈关系的演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60. 李大龙、李渊：《使者与唐王朝边疆民族管理体制》，《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61. 王嵘：《西汉和亲政策与汉文化的传播》，《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62. 雍秉乾：《略论西汉文景时期对匈奴的积极防御政策》，《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63. 董建勇：《两汉对西域的统治及其比较》，《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64. 李大龙：《“用夏变夷”与刘敬的和亲政策》，《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65. 龚留柱：《“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秦汉时期边疆思想论略》，《南都学坛》，2000年第4期。
66. 陈建林：《略论汉代名士气节》，《孔子研究》，2000年第5期。
67. 胡宏起：《汉代中国与中西亚诸国》，《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68. 黄云：《秦汉政权和匈奴的关系》，《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69. 高红梅：《汉文化对匈奴社会影响初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70. 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
71. 贾碧英：《汉代的汉匈文化交流》，《华夏文化》2002年第1期。
72. 殷晴：《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
73. 余从荣：《汉匈和战与汉朝经济、政治之关系》，《五邑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74. 郝树生：《浅议李广利伐大宛的功过是非》，《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75. 黎虎：《汉代外交使节的选拔》，《兰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76. 贾雪枫：《汉使身份考》，《文史杂志》，2002年第6期。
77. 袁延胜：《也谈〈过长罗侯费用薄〉的史实》，《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
78. 王庆宪：《从两汉简牍看匈奴与中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79. 周国琴：《读匈奴史札记三则》，《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80. 黎虎：《汉代外交使节的人选》，《人文杂志》，2003年第6期。
81. 黎虎：《汉代外交使团的组成》，《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
82. 周学锋：《简析汉匈争夺西域之战与两汉时期中央政府西进策略》，《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83. 阎盛国：《汉朝招降匈奴策略述论》，《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84. 陈彦辉：《中国古代外交机构编制及其职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85. 黄朴民：《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86. 宗立书：《西域使臣张骞》，《中国民族》，2004年第3期。
87. 贾丛江：《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
88. 谭前学：《秦汉时期的汉匈文化交流与融合》，《寻根》，2004年第6期。
89. 王庆宪：《匈奴与西汉频繁密切的使节往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90. 李大龙：《西汉王朝藩属体制的建立和维系》，《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

后 记

流年似水，逝者如斯！金城求学三载，匆匆，太匆匆！论文付梓之际，忐忑不安之感益深。深恐肤浅之文，见笑于方家！

研究生三年，忝列雷紫翰先生门下，深感荣幸之至！先生学识渊博，为人谦和，道德文章俱佳。他善于为学生营造一种良好的精神文化氛围，置身其间，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使我略窥治学之门径。恩师杏坛之教，弟子永生铭记！

受业期间，承蒙高伟、乔健、汪受宽、吴景山等诸位先生传道、授业、解惑，在此谨向诸位先生致以深深的谢意。

家境不宽，然求学二十余载，悠然度过，得益于父母黄土地上的辛苦耕耘和耄耋之年爷爷的慷慨资助。已近而立，然无以为报，深感愧疚！

本文的完成得益于室友、同窗的多方协助和师妹师弟们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谢过。

一切都会过去,一切转瞬即逝；凡是那逝去了的，都将成为美好的回忆。未知未来，未来未知，前途路漫漫，“吾将上下而求索”。

崔丽芳

二零零六年五月